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06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3月

目录

本期导读	01
学术聚焦	02
中国经济增速新目标、增长法宝与共同富裕 林毅夫	02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与发力点 许宪春	07
振兴消费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大挑战 姚洋	11
疫情期中美经济镜像关系 卢锋	14
关注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 黄益平	20
问答 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与前景 林毅夫、许宪春、姚洋、卢锋、黄益平	23
月度精选	29
站在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余森杰	29
不能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解释短期的经济下行， 不能轻易放低GDP增速目标 余永定	32
房地产政策短期松动不改长期趋势 赵波	36
数字化时代的女性领导力 陈春花	41
浮躁时代，我们为何更需要长期主义？ 宫玉振	45
学院资讯	53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06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6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内容主要还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内容。学术聚焦的内容来自我们在3月15日举办的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主题是“两会解读暨中国经济前景”，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卢锋教授、黄益平教授，以及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战略与共同富裕、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难点与发力点、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与振兴消费的重要性、疫情以来中美经济的镜像关系、

为什么要关注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等问题，分享了他们的深刻见解。

本期的月度精选有五篇文章，分别是余淼杰教授对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谈中国经济的结构与速度的关系，赵波副教授对房地产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分析，陈春花教授关于数字化时代女性如何发挥领导力，以及宫玉振教授讲的为什么浮躁时代更需要长期主义，都非常有启发性。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2年3月31日



中国经济增速新目标、增长法宝与共同富裕¹

林毅夫²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两会刚刚结束，我作为政协委员，很高兴借此机会跟各位谈谈在两会上委员代表们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热点很多，我想集中谈三点：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创新发展、共同富裕。

5.5% 是合理且实事求是的增长目标

我高度重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速是最大的大局，是最大的政治。

第一个原因，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经济体量越大，并且服务业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就必然越大。如何让经济体量变大，让服务业的占比提高？当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而提高收入水平就需要经济增长。

第二，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等等，但是经济是基础。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目标定在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50%，这是韩国在 2002 年时与美国的差距水平，应该是一个不算过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 20% 多，要从只有 20% 多变成 50%，而且希望在 2049 年就实现，那当然必须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怎样来驾驭这个大变局？我想，只有到我国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 50%。那时，美国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到那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时我国的京津沪和东部发达的沿海五省人均 GDP、产业和技术水平可以和美国相当，美国也没有技术优势来卡我们的脖子。不仅如此，贸易是双赢，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美国的大企业

1.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2022年3月15日北大国发院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2.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需要中国的大市场来维持在世界的地位，美国国内经济也需要中国的大市场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就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上这些都说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包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

我曾反复讲，中国到2035年之前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此处强调一点，我讲的是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什么含义？就像各位买汽车，要看该汽车设计的最高时速。增长潜力是从技术面来看，在不引起通胀、不过度消耗自己未来发展的各种资源的状况下，可以维持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到2035年之前应该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并不代表我们每年都要以8%的速度来增长。就像汽车设计的最高时速可达300公里，但并不代表每次开车都要开到时速300公里，实际的时速还需要考虑天气状况、路况、身体状况等因素。我们在发展过程中，8%的增长潜力代表可能性，我们也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其他方面的要求和状况。

我也曾在多个场合谈，在有8%增长潜力的情况下，考虑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因素，我们到2035年之前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的增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目标比我的预期低，是5.5%左右。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目标设定是实事求是。因为，我在测算8%的潜力、6%的增长时没有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以及一些矿产资源价格都猛涨。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给国际金融构成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输入国，也是各种原材料和粮食的最主要进口国，会影响到我国的进口和发展的成本。因此，我认为今年把目标定在5.5%左右是合理且实事求是的。

我国现在的GDP规模已经占到全世界的18%以上，即使以5.5%的速度增长，中国可以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仍能占到世界经济增长的25%左右。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同时也能很好地保持中国自身的基本发展态势。

我们现在提出稳增长，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如果我们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超过5.5%，让它更接近6%。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我们决不能轻易舍弃的法宝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发展的主要来源。

问题是怎样创新？学界和媒体一谈到创新通常强调的是新发明，学术界就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创新，基本上衡量的是发明对增长的贡献。但是这样的思路与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受到我们所读的主流经济学影响。我们要清楚的是，主流经济学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好，所以要技术创新必须靠发明。而且，发达国家的产业附加值已经是全世界最高，所以要产业升级也只能靠发明新产业。

众所周知，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但在增长核算时，这些研发投入并没有在增长核算里面作为投入要素放进去。所以，大家非常崇拜的TFP，实际上是在增长核算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释的剩余项，然而，这个剩余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发明新技术的投入所带来的。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其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年3%左右，这其中人均GDP或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2%左右，人口增长为1%左右。



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对于追赶国家而言,创新的含义和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好,下一期进入的产业附加值比现在的高。

前面提到,在发达国家创新就只能靠发明,因为它们的技术已经全世界最好,产业附加值已经全世界最高。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技术远非全世界最好,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通常而言,这一创新方式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附加值又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也是产业升级。而且这种方式通常的成本也比自己发明新产业低,风险也比较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其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也就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是购买包含更好技术的设备,这些投入就表现在资本的增加上,增长核算的剩余项也就是 TFP 就会显得比发达国家低。

我们需要打破 TFP 迷思,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且低成本增长的重要法宝。事实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年均 9 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有多少是靠我们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而取得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日本、美国当年处于追赶阶段时,也是较快的经济增速和较小的 TFP。

现在学界也有讨论,说我们用引进消化吸收取得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 40 多年,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2551 美元,马上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再进行引进消化吸收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全靠自己发明新技术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像现在媒体和

学界常说的,要追求以 TFP 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创新方式了?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我国实际经济状况是什么样。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中国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 一是追赶型的产业,即我们有,发达国家也有,但是我们的技术或产值不如发达国家;
- 二是领先型的产业,即我们的产业已经是世界第一,如家电产业、5G 通讯等等;
- 三是转进型产业,过去我们很有比较优势,在世界领先,但是现在失掉了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 四是换道超车型,即给我们带来换道超车机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新经济产业,因为新经济的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我们在新经济的研发上不仅是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而且由于其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们是人力资本大国,有国内大市场,而且产业配套齐全,所以我们在新经济领域有优势,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 五是战略型产业,即发达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但是由于国防、经济安全等原因而导致我们无法引进的产业,会被“卡脖子”而必须自己发明的产业。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但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样。实际上,我国经济当中绝大多数的产业还是追赶型的。例如,2021 年,我们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是 15.1%,也就是还有 85% 的制造业并不是高新制造业,绝大多数还是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再如,每年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工业展览会,根据媒体报道,今年总共有 27 个展厅,每个展厅里都有中国产品,但是中国产品在绝大多数展厅里面的价格比别国产品低得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跟其他国家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因此,我国绝大多产业还是追赶型,

而追赶型的技术创新的最好方式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

最近总书记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在台湾读小学时也听过这个故事，因为最早是孙中山讲的。他讲，以前中国很穷，有个工人在码头当苦力，用扁担挑东西谋生。有一次买了一张彩券，中了头奖。他以为马上就要变成富翁了，就把扁担丢掉了。他去领奖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张彩券，原来是他把彩券放在那个随时带在身边谋生的扁担里，现在扁担丢了，彩券也丢了。总书记是在谈我国能源转换的时候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我们的传统能源比较多，但是不能在新能源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一下子把传统能源全部舍弃掉。

同样的道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关系到我们85%的制造业，这个法宝不能丢。我希望媒体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希望学界把这个理论框架理清楚，不然，把我们四十多年来取得高速发展的法宝、创新的法宝丢了，就太可惜了。

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好途径

创新不管是自主研发或是引进消化吸收都需要靠企业家，不管是在传统产业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企业家，或是在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或是走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转进型的产业里创新都需要靠企业家。企业家创新会面对很大的风险，如果成功获得的回报会比较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比较高，这是给予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必要激励。

如果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没有比较高的收入，那就不会有人有动力去追求创新。如果不创新，经济发展就会慢。一旦经济发展慢下来，不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共同富裕是最近的热点话题。其实共同富裕

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都在追求的。但最近社会上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疑问，“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是不是要大家都拿平均收入？”如果是那样，必定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引起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

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企业家精神？不见得，取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且能够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原因在于，如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就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并且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就会形成竞争优势。这当然就会使我们得到效率。

由于穷人的收入主要靠劳动所得、靠就业，富人的收入更多靠资本收益。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是有利于穷人的发展。

不仅如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形成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会更快，资本积累也会非常快。逐渐的，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这种变化时，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会非常快，穷人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值钱，另一方面，资本的相对回报降低，富人拥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的价值在下降。这会使得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东亚几个国家在处于追赶阶段时，就实现了增长和分配的同时改善。在国内我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其经济增速会加快，收入分配也会改善，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再进一步，如果经济增长快，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多，并且按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政府增加的财税就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二次分配，可以投



资于提供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教育，让他们有更高的就业能力，以及用于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照顾鳏寡孤独等，收入分配就能进一步改善。

2007年之前，国内学界和政府的政策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这是过去的说法。过去讲初次分配重视效率时，经常用技术指标，认为资本、技术越密集，就越有效率。其实并非如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才会有效率。

2007年初我做过几个报告，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证了按比较优势发展能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很高兴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就把过去的“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说法改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基本上就是我讲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

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发展得很快，结构变迁也会非常快，会有一些经营天才抓住结构转型的机会，再加上有新经济的换道超车给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去进行发明，也会有一些技术天才抓住这个创新的机会，这两类天才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超级巨富，这样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钱对于超级巨富来讲只是符号，他们也用不完。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税收制度来鼓励富豪们捐赠，并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来尊重他们对社会的回馈，就可以用三次分配来进一步实现公平。

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落实十七大设定的在一次分配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分得越来越好，然后再辅之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中国即将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最后我再谈一点，什么时候中国可以跨过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国家？

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2021年7月份以前，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 12535美元。如果用旧门槛来衡量，去年中国就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去年7月，世界银行、联合国将高收入国家门槛调整到12695美元。我们去年距离这个新目标还有1.8个百分点。

如果今年我们能实现5.5%左右的增长，并且汇率不发生大的变化，中国今年就应该可以跨过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当然，12695美元的标准是按照现价汇率计算的，汇率会波动。但我认为，不论汇率如何波动，即使我们今年不跨过这个门槛，明年也应该能跨过这个门槛。在内外环境没有巨变的情况下，我相信最晚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一定可以跨过这个门槛。

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我们非常有幸，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行列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1900年时八国联军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23%，过去100多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长则没有发达国家快，跨不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至于到现在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在世界的占比只有16%，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之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翻一番，从16%变成34%。

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证这个历史。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与发力点³

许宪春⁴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我今天谈一谈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发力点，主要围绕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我认为5.5%的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也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需要为此采取一系列的努力措施。

5.5% 经济增长目标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2年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主要考虑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在我看来，在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甚至还多点散发的客观情况下，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都着眼于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这一目标的设定也是为了与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以及“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

我认为，5.5%是“三个衔接”的经济增长目标。

一是与“十三五”时期前四年的经济增速相衔接。“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6.5%以上。“十三五”时期前四年，也就是2016年到2019年，GDP增速分别为6.8%、6.9%、6.7%和6%。显然，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增速呈回落走势，特别是2019年经

济增速已经回落到6%。因此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和“十三五”时期前四年的经济增速相衔接的。

二是与近两年疫情冲击下的年均经济增速相衔接。2020年中国经济受疫情严重冲击，GDP只增长2.2%。由于基数很低，2021年GDP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因此，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与近两年GDP平均增速相衔接的。

三是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相衔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未明确给出“十四五”时期GDP具体增长目标，而是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增长目标。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维持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符合“十四五”规划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的原则要求。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因此，5.5%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与2035年远景目标相衔接的。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新情况，我国国内经济运行也存在许多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逐年确定GDP增长目标可以做到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2022年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既符合当前

3. 本文根据许宪春在2022年3月15日北大国发院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4. 许宪春：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技术组中方主席。



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原则要求。

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前最重要的仍是将蛋糕做大，即便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付出努力推动经济增长。

挑战性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当前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了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并非轻易就可以实现。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存在挑战。

第一，消费需求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5.4%，不仅贡献大，而且一举扭转了2020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的不利局面。

尽管如此，当前消费需求增速距疫情前水平仍有差距。2020年和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名义增速为5.7%，实际增速为4%，比2019年分别降低2.9和1.5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与居民收入两年平均增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此外，疫情期间居民收入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之间差距拉大，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说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低于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速，特别是低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这部分群体收入增速较低，自然不利于提升消费需求增速。

第二，投资需求表现较弱。2020年二季度，

投资需求对经济恢复发挥了主要拉动作用，但从2021年一季度起，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小，对2021年全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3.7%，不仅远低于消费需求65.4%的贡献率，也低于净出口需求20.9%的贡献率，在三大需求中贡献率最低。其中，2021年四季度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6%，这是历史上少见的情况。

因此，2021年投资需求较弱。投资需求较弱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得非常快。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4%，低于全部投资4.5个百分点。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0.6%，比2019年低3.2个百分点，与疫情前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回落。202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4%，增速从3月份开始持续了10个月的回落，从2020年的表现最好变成2021年的投资拖累项。

说到固定资产投资，我们重点关注三大领域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三大领域投资占整个投资的70%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投资的走势。2021年，上述三大领域投资中，只有制造业投资明显向好，增速甚至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都不尽如人意，对整个投资形成拖累，直接导致投资增速的回落。

第三，净出口需求面临较大压力。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21年年底，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突出，2021年贡献率高达20.9%，但2022年净出口需求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发达国家生产逐渐恢复，供需缺口收窄，对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支撑作用可能减弱。另一方面从贸易竞争国来看，随着之前遭受疫情重创的一些新兴国家生产逐渐恢复，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有一部分将转移至这些贸易竞争国。此外，由于2021年的基数比较高，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很可能会回落。这一点从3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已经能够看出来，与2021

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速明显回落。

从生产角度看，有几个行业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制造业。2021年一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8%，四季度增长3.1%，增速回落了23.7个百分点；二是建筑业。2021年一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8%，四季度下降2.1%，增速回落了24.9个百分点；三是房地产业。2021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4%，四季度下降2.9%，增速回落了24.3个百分点。如果把上述这些数据串联起来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回落，我国的供给面临着挑战和压力。

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中国GDP在2000年超过10万亿元，在2012年超过50万亿元，在2021年超过110万亿元。在2021年GDP110多万亿元基础上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在2012年GDP50多万亿元基础上增长2个多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在2000年10多万亿元基础上增长11个多百分点的增量。即使剔除价格因素，在2021年GDP基础上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也相当于在2012年GDP基础上1.8个百分点的增量，在2000年GDP基础上增长5个多百分点的增量。

因此，5.5%的经济增长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多点散发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十分积极并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增长目标。

着力点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看，2022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2%，比去年全年加快7.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20.9%，有望继续为2022年投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1%，比去年全年加快7.7个百分点，有望继续企稳回升。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3.7%，比去年全年回落0.7个百分点。近期多个城市陆续推出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加点、下调住房贷款首付比例等措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今年可能会扭转去年增速持续回落的态势。

从生产角度看，首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步回升。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超过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超过90%，所以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部分。2021年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到达全年低点，10-12月的增速分别3.5%、3.8%和4.3%。今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回升，达到7.5%。尽管2021年三季度发生了诸如汛情、电力短缺、煤炭短缺、芯片短缺等偶发性因素，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之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出恢复迹象，未来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将保持良好的势头，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其次，建筑业增加值增速有望回升。2021年建筑业增加值增长2.1%，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低6.1个百分点，其中三、四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下降1.8%和2.1%。但随着今年1-2月份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好转。一季度，建筑业增加值有望在上述利好因素带动下恢复正增长。

再次，从服务业角度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新经济新动能的代表性行业。2017-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即便在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候，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明显下降，该行业仍然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且保持逐季回升态势。随着疫情好转，该行业的增速逐渐提高，2021年该行业增加值增长17.2%，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增速均起到重要拉动作用。预计该行业在2022年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此外，还有诸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等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随着疫情好转将得到恢复。

因此，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生产的角度看，通过正确而持续的努力，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需求的恢复，长期来看，应注重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短期来看，应从保就业入手，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

为促进投资和生产，应注重保市场主体，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为保障净出口需求的稳定，可以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一方面，加强出口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利用我们网络销售、电子商务等一系列新模式推进外贸增长。尽管净出口面临较大压力和挑战，我们还是要尽力采取多种措施稳外贸，避免增速回落太快。

振兴消费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大挑战⁵

姚洋⁶

北大国发院院长、东南大学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政府工作报告的三大亮点

我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感到今年的报告有很多往年少见的新亮点。

亮点一：稳增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力度引人注目。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的主要目标，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显著体现了这一点。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都非常大。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今年一季度扩表（扩大资产负债表）7400多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政策力度非常大。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大。今年用于拉动地方政府投资的专项债为3.65万亿，在此基础上又提出2.5万亿的减免税收。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因为全国每年的一般财政收入为20万亿左右，2.5万亿就意味着今年仅仅减税就会达到10%以上，表明中央政府保市场主体的决心很大，力度少见。

亮点二：对“双碳”路径有了新表述。今年的政策目标中明确提出“‘双碳’目标要切实可行”。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要对过去几年一些地方把落实“双碳”目标搞成运动式减排的情况做出调整，非常必要、及时。

北大国发院每年会出一份大型报告，今年报告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的“双碳”路径。在这份报告里，我们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做了评估。

结果发现，按照“十四五”规划，我们即便稳步降低碳排放，到2030年也可以实现“碳达峰”目标。假设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为5.5%（实际增长率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目前我国的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60%，在全部碳排放中的占比为80%。按照“十四五”规划，我们的能源效率每年要提高3%，煤炭在全部能源消费中占比要降低10%，折合下来，每年碳排放下降1.65%。1.65%加上3%，即碳排放可以下降4.65%。此外，排放技术升级方面还有潜力可挖，使碳排放可以降到更低。如果每年的排放效率再提高0.8%-0.9%，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对冲掉经济增长5.5%产生的碳排放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双碳”的新提法，也为煤炭工业指明了一条路。两会上，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我国仍然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煤炭在中国全部能源消费中占大头，即使在“十四五”期间降低10%，占比仍将达到50%。即便“十五五”期间占比再降低12.5%，仍将占比37%。这意味着到2030年，煤炭在我国的能源消费里将仍保持较高比重。

怎么用好煤炭？我认为要依靠一些清洁煤炭的技术，比如煤制气、煤制油等。尽管这些技术现在看起来不太划算，但只要有投入，让它们像新能源一样发展起来，价格还可以继续降，也许

5. 本文根据姚洋在2022年3月15日北大国发院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6.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东南大学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未来和太阳能一样,能把成本降到火电成本以下。

亮点三,对房地产调控有了新表述。数据显示,房地产在去年下半年是负增长。房地产产业链非常长,不只是卖房子,也不只影响建筑业。房地产行业好,建材、家电行业才会好,因为大家买了房都要装修、买家电。如果房地产行业进入负增长,整个消费也会跟着往下走。去年我们经济增长减速,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房地产行业负增长。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房地产应该“鼓励长租房”。怎么鼓励?我们好像总是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我认为这件事其实也不难,比如当开发商拿到一块地后,政府要求他必须把其中的四分之一拿出来建长租房。开发商自己干不了的,可以找合作者,剩下的事情市场总会解决。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在保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因城施策”。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城市开始行动起来,有些城市把首付已经降到了20%。但事实上,我又有些担心房地产行业在今年下半年过热。自疫情以来到去年年终,房地产对于经济复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去年上半年房地产过热,中央出台了“三条红线”,最后对房地产的打击非常大。因此,还是应建立起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避免出现去年那样政策上的大起大落。

保增长的重点在促消费

今年我们要保5.5%的经济增长率,重点在哪里?5.5%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达到的目标。我自己测算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4.65%-6.5%,中位数刚好是5.5%。过去两年的实际增长率平均为5.2%,所以今年要达到5.5%的目标有难度。从1-2月的情况来看,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宏观政策对稳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效果能不能持续?要谨慎看待。

财政政策方面

基建投资是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块,但从2018年开始,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路下行。过去两年,政府支持基建的力度仍然非常大,但基建每年的增速仅2%-3%,转化为经济增长率已经是很小的数字。

今年的基建增速能不能达到7%-8%甚至10%?我感觉有难度,主要是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基建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地方政府能找到的好项目越来越少。中央也发了文件,认为高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发展,很多高铁线路不赚钱。地方政府对基建的感受恐怕也一样。

第二,2018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地方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中央需要他们投资,但给钱不够。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提出的基建总额都在30万亿以上,即便这30万亿可以分好几年,但折合到每年恐怕也远远不止3.65万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如果想把很多大项目做成,必须去市场上融资,承担起商业性债务,这又与中央提出的去杠杆要求相悖。两难之下,地方政府对投资的积极性下降。

即使地方政府愿意去投资,我们也要对债务问题保持警惕,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城投债在2020年增加4万多亿,去年又增加6-8万亿,可见增速很快。同时这些商业性债务的还款期限很短,地方政府很快就会面临偿付问题,最后又得来一次债务置换,不可持续。

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的效果是越来越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并没有从多发的货币和降低的利率中获益。比如央行多发货币使利率从3.5%降到3%,国有企业从中获利更多,民营企业的利息通常至少是7%-8%,甚至10%以上,利率一点点的变动传导到民企几乎可忽略。

同时,在预期减弱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民

营企业也不愿去贷款。我们希望通过给企业免税、减少金融负担，促使企业通过借钱来维持经营，把工人留下来。这相当于政府单方面想让企业借钱去保就业，但不符合企业的基本逻辑。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是微观传导机制有问题，深层的原因是对民营企业一直存在歧视，表层和短期的原因是大家的预期减弱。

供给侧方面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两年政策把着力点放在供给侧需要反思。

过去两年，我们的出口增速很快，去年达到20%以上，已经回到本世纪前十年的超高水平。今年出口的增速可能为10%-15%，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折算下来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1.5%-2%，因此拉动GDP主要还得靠国内需求。

目前政策把着力点放在供给侧，但现在全国产能过剩，产品滞销。我们要知道经济是个闭环，每一年的总生产应该等于总需求。如果产能过剩时还鼓励企业多生产，明显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需求侧方面

在需求端，投资受制于预期下降，所以必须提振国内消费才行。

一般的看法是，如果想提振消费，大家的收入必须提高，否则消费上不去。但是，凯恩斯在一百年前就告诉我们，消费想上去是有办法的，即促进“自主性消费”，即不依赖于收入的消费部分。因此，当经济增速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时，应该进行需求管理，刺激消费，政策应该把重点

放在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上。

怎么提升？当然不能靠内生型消费（收入增长驱动），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给全国每人发1000块钱左右，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3或者5）计算可知，每人1000元左右可以带动4.5万亿至6万亿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疫情防控要既精准又开放

同时，我们的疫情防控应该做到“既精准又开放”。现在正处在全球第四波疫情，鉴于目前香港疫情的严重性，我们继续实施严防严控的措施有必要。但当这波疫情压下去之后，未来要努力尝试不再通过封社区、限制城市间通行等方式来控制疫情，因为国内消费和出行密不可分，一旦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停滞，经济复苏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疫情防控，现在还有一种核酸检测可以当场出结果。类似这样的防疫技术研发可以加快，使用范围扩大，争取以后能推广到每个机场、餐厅和酒店。中国有聪明才智的人非常多，应该能很快找到一条“既精准又开放”的防疫路径，让我们在防疫的同时不再严重影响消费。

总而言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看点非常多，我们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大，促消费仍然是重点中的重点。



疫情期中美经济镜像关系⁷

卢锋⁸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这里镜像一词，是对比较差异或反差的一个形象表述。21世纪初年我国开放经济强劲增长，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与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形成反差现象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笔者2008年有篇题为“中美经济外部不平衡的‘镜像关系’”论文分析这个问题。

近两年多中美经济形势在更大范围呈现镜像关系，不仅表现为疫情期外部不平衡的对称性扩大，也体现为两国经济增速、总需求结构以及通胀形势的反向比较特征，彰显两国经济互补性以及疫情防控和宏观政策差异对经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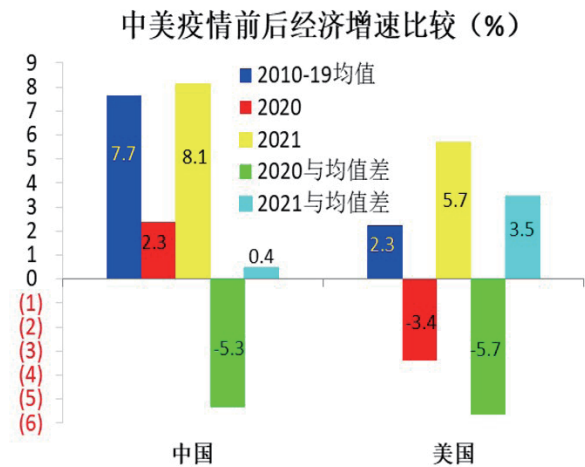
下面先观察两国经济反差镜像的多方面表现，但侧重从疫情防控与宏观政策特点方面分析其双重成因，最后讨论这方面观察对理解目前国际经济一些现实问题的启示意义。

中美经济镜像关系表现

观察比较疫情期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几方面比较特征形成系统反差或镜像关系。

一是两国经济增长呈现比较特点：2020年受疫情冲击同时大幅收缩时，中国相对降幅较小而美国跌幅更大；2021年两国经济反弹时，中国经济增长绝对水平显著高于美国，但是相对回升幅度较小而美国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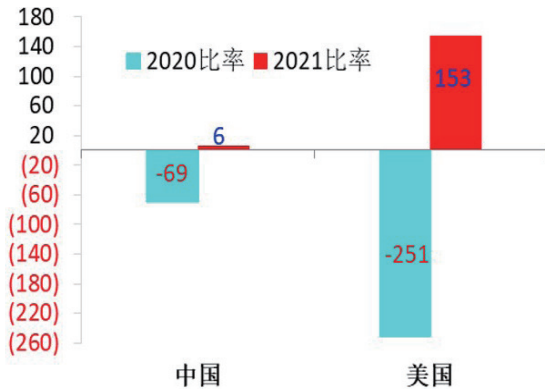
下图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经济录得-3.4%战后最大跌幅，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到2.3%仍保持正增长。部分受基数效应作用，2021年我国GDP增速反弹到8.1%，比上年增速提升5.8个百分点，然而比疫情前十年增速均值仅超出0.4个百分点，相对提升幅度为6%。作为比较，2021年美国经济增长回升到5.7%，绝对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不过相对其上年-3.4%增速提升9.1个百分点，另外与其疫情前十年均值比较相对提升1.53倍。总之去年我国经济增长绝对水平显著领先，不过增长低于年初市场预期，与美国比较也有弱势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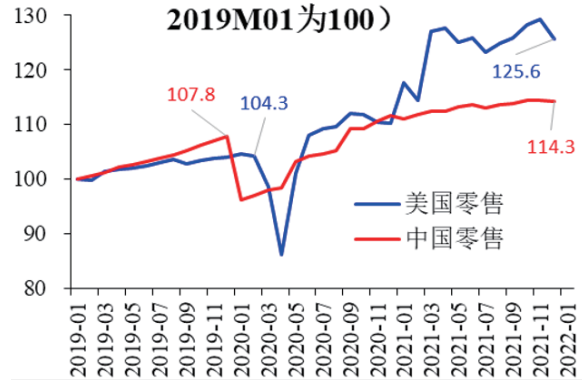
7. 本文根据卢锋在2022年3月15日北大国发院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8. 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目前担任财政部、人社部顾问和国际组织AMRO咨询组专家成员。

2020和2021年中美经济增速相对疫情前十年均值的相差比率(%)



中美两国商品零售指数比较 (2019M01-2021M12, 季调, 2019M01为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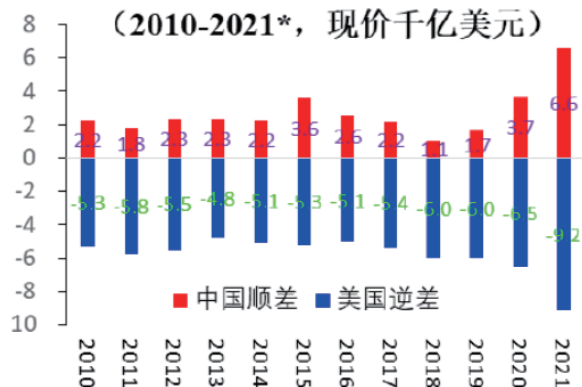
二是两国生产和消费复苏程度的比较差异。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大幅收缩后不久，中美生产和消费都快速恢复，但是供求两端复苏程度呈明显反差。以工业生产作为供给端代表，中国复苏很快而美国大尺度滞后。下面左图显示，以疫情前2019年1月基期为100，到2021年底中国工业生产指数上升到118.8，三年平均增速近6%。美国该指数到2021年底仅为98.8，尚未完全恢复到基期水平。然而需求侧商品零售复苏则是美国快而中国缓：下面右图显示美国商品零售指数2021年底已增长到125.6，三年平均增长7.9%；同期中国商品零售指数增长到114.3，年均增长4.6%，大幅低于美国。

三是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与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外需变动反差。与开放宏观经济自发调节逻辑相一致，上述生产与消费反差折射的两国供需不平衡矛盾，通过贸易活动反向规模扩大得到自发调节。美国表现是贸易逆差扩大扩大供给弥补国内供不应求缺口。下面左图美国数据显示，2019年贸易逆差为5963亿美元，2020年增加到6512亿美元，增长了549亿美元；2021年进一步上升到9159亿美元，增长2647美元；两年共增长3196亿美元，年均增长1598亿美元，相当于这两年美国GDP均值0.73个百分点。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逆差增长对总需求增长负贡献应是疫情前的数倍。

中美和全球工业生产指数 (2000M01-2021M11, 2019年1月=100, 季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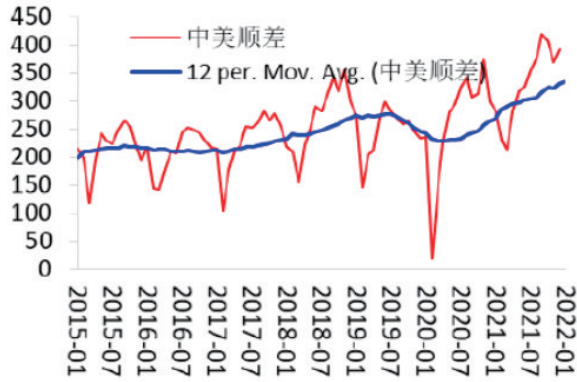


中国与美国净出口 (2010-2021*, 现价千亿美元)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015M1-2022M1，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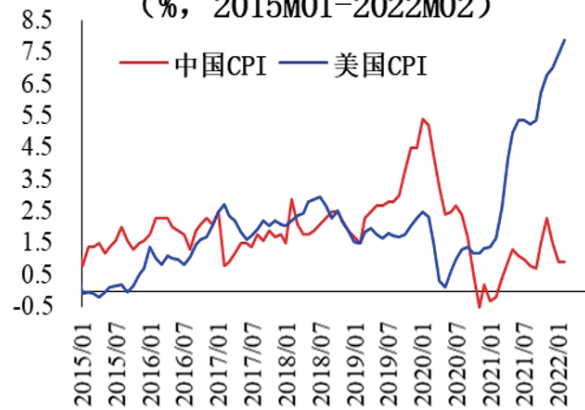
我国疫情期外贸动态调节国内供求不平衡情况正好相反：2020-2021年我国外需对GDP增量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2%，与疫情前十年该指标平均值-2.1%负贡献率几近霄壤之别，显示我国近来宏观经济内需不足和供大于求矛盾，通过扩大净出口和外需增加得到合意调节。另外上面右图显示疫情期中美双边的贸易不平衡规模也显著扩大，初步统计显示两年中国对美顺差总计7142亿美元，年均3571亿美元，比疫情前2015-2019年的均值2824.8亿美元增加了约21%。

四是两国通胀表现反差。与两国总需求增长相对态势相一致，叠加某些特殊因素例如猪肉价格周期对我国消费物价影响，2020年两国消费物价共同回落背景下中国通胀水平显著高于美国，但是2021年美国通胀大幅飙升时我国消费物价显著走低，美国高通胀与我国消费物价低位形成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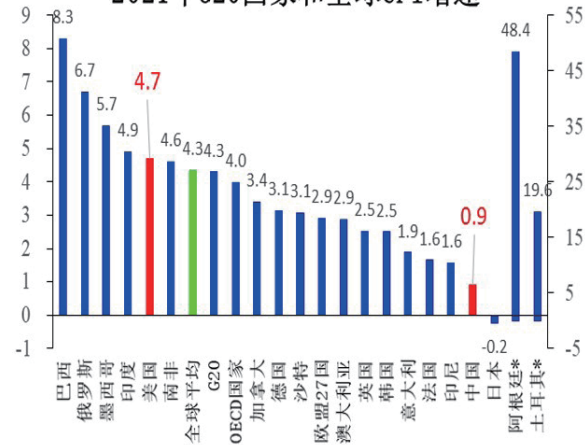
下图数据显示，2020年中美消费物价都经历先升后降过程，但是中国消费物价在2019年底基数较高，加上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近50%，因而全年消费物价增速为2.5%，显著高于美国的1.2%增速。2021年我国消费物价月度数从年初零值上下低点波动回升，但是全年增速0.9%反而显著低于2020年，也低于疫情前五年2%的

均值，可以说边际存在类通缩压力。美国2021年CPI年度增速达到4.7%，今年1-2月仍持续飙升。具体看消费物价月度增速，2021年初延续2020年4-5月份回升走势，年中超过5%提示已出现显著通胀，年底达到7%几十年未遇通胀，今年2月进一步攀升到7.9%高位。

中美CPI通胀同比增速（%，2015M01-2022M02）



2021年G20国家和全球CPI增速



另外G20成员国通胀比较特点也呈现2021年中美通胀反差。上面右图报告2021年G20成员国CPI增速以及G20、OECD和全球CPI均值，可见美国4.7%全年涨幅在在G20发达国家成员中涨幅最高，比主要发达国家中涨幅第二的加拿大3.4%高出近四成，也少见地高于G20、

OECD 和全球 CPI 均值。然而中国 0.9% 消费物价年度增速在 G20 新兴经济体成员中涨幅最低，在所有 G20 成员中仅次于全球范围内持续通货紧缩标杆国日本。

镜像表现的双重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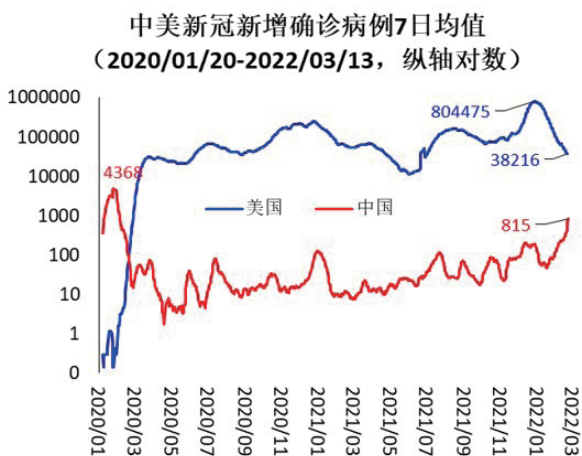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近年中美经济增长、产销关系、外部平衡和通胀形势出现反差和镜像关系？近年中美经济面临最大环境变异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共同背景决定两国经济运行呈现某些类似表现，如宏观经济关键指标都经历 V 型波动，宏观部门都出台超常干预措施应对等等。但是中美具体国情与决策思维不同，疫情防控策略与宏观调控表现出深刻差异，对两国经济反差镜像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是百年不遇流行病和公共卫生事件，中美都采取了积极防控措施，然而防控方针和措施与绩效存在深刻差异。面对 2020 年初大规模疫情冲击，中国迅速举国动员全力围堵，较快实现新增病例与所有病例清零。针对后续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的零星和散发疫情，在大力推广疫苗全程接种同时，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和动态清零方针，同时重视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针对今年 2 月底以后部分地区新增病例较快增加，决策层进一步提出强化实施动态清零方针，要求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

美国疫情大规模流行后也曾采取各类社交距离干预措施，不过从政府到民间一直较重视群体免疫选项与病毒共存策略。随 2021 年大规模接种疫苗和自然免疫人数增加，各地开始尝试逐步退出防控管制措施。在德尔塔等病毒变种大规模流行时，又间歇和局部再采用各类管制措施。针对 2021 年底流行的奥密克戎变体流行病学新特征，最近出现新一轮放开包括“口罩令”等防控管制的趋势。总之与其它主要西方国家类似，美国较早放弃清零目标，根据形势变化实施多元化

策略，试图通过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以渡过危机。

中美疫情应对策略差异有深刻的治理体制与历史文化原因，其防控效果与经济影响也有重要差异。我国高强度管控模式在遏制疫情方面成效突出，确诊感染病例与死亡人数比美国低出好几个数量级（下图），相关人均量指标优势更大。当然任何防控模式都利弊互见，高强度管控需对社会成员选择度施加较多限制也有相应成本。就经济影响而言，我国围堵清零与动态清零对经济供给侧复苏更有利，对工业生产和出口能力恢复和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严格实施各类社交距离管控，个别地区为动态清零采取隔离封禁措施，对经济需求面复苏客观上也有不利影响。上述成效与美国防控模式影响形成对比，一定程度上派生两国经济的系统性反差镜像。



另外两国针对疫情冲击下经济收缩都实行了逆周期调控政策，不过宏观刺激政策在规模大小、时间长短、聚焦对象上都有明显反差，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通胀走势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对比差异。

受疫情危机形势倒逼，同时由于多年来宏观政策理论思维朝激进干预方向演变作用，美国在疫情期实行了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笔者“通胀之约：美国新通胀怎样炼成”一文中作了大致梳理



财政政策两年赤字率分别超过 18% 和 10%，财政刺激规模数倍于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零利率加上扩表，美联储资产规模从 4.2 万亿增加到 8.9 万亿，比上轮量宽 2017 年 4.48 万亿美元峰值高出近一倍。在实施时间方面，在 2021 年 3 月经济强劲反弹时仍追加 1.85 万亿美元财政援助刺激法案，货币超级量宽政策到去年 11 月才启动购债减量，零利率政策直到最近通胀接近 8% 才开始改变。

我国在 2020 年上半年密集实施较大规模积极宏观政策，鉴于疫情形势趋于稳定和 2 季度经济快速反弹，7 月底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方针，伴随刺激政策规模和强度回调与逐步退出。2021 年我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 6% 以上”，宏观方针要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过财政赤字率、广义货币和社融总额增速等宏观指标不同程度回落，加上一些部门出台较大力度监管和产业政策客观派生收缩性效果，经济政策实际执行上出现边际收紧。我国宏观刺激较为审慎克制，避免了美国过度刺激带来过热和通胀问题，同时也面临如何优化政策更有效稳增长问题。

两国刺激政策在供求两端着力点也表现出对称性差异。例如大规模基建投资一直是我国财政和产业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手段，另外这次疫情期我国财政扶持政策比较聚焦减税降费和组合式税费支持，对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提供支持，政策意图是通过“根部施肥浇水”达到增长、就业和民生的“三稳”目标。一些城市也尝试实施为居民提供消费券补贴，然而财政救助政策总体呈现向供给侧倾斜特征。美国超强刺激政策也包含对企业和房地产信贷和其它金融（购债）支持，然而大部分财政刺激资源通过失业救济、疫情津贴、个人信贷展期等直达个人消费主体，突显向需求端倾斜的刺激特点。宏观刺激政策相对规模和持续时间差异对总需求反弹相对力度显然有相当影响，另外宏观政策着力点不同对产消关系和通胀反差也有解释作用。

几点相关讨论

观察疫情期中美国经济镜像表现并梳理分析其成因，对理解目前国际经济一些现实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例如观察两国通胀反差有助于从国际比较角度认识美国以及全球新一轮通胀真实根源。美国新通胀确与疫情环境有关，然而仅有疫情冲击不足以导致美国目前近乎失控的高通胀，过度宏观刺激政策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经济都经历疫情大流行冲击，然而两国通胀呈现高低反差，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新通胀并非疫情冲击必然结果，而是需结合疫情防控策略与宏观政策差异给以全面理解。

又如疫情下中美国内产消不平衡与外部不平衡变动之间联系，提供了一个解释经济全球化积极功能的现实案例，也彰显了中美经济互补性及互利合作潜力。贸易不平衡往往引发逆差方抱怨责难，然而给定疫情下国内产消供求不平衡加速扩大的背景，借助扩大贸易不平衡调节国内供求缺口的合理性不言自明。就中美宏观经济与通胀镜像关系看，去年美国如不能扩大进口和贸易逆差，其年底 CPI 增速可能超两位数，目前形势会更难应对。当然，这两年我国如果没有外需扩大配合，国内经济稳增长压力也会相应增加。

上述观察提示两国宏观政策存在交流互鉴的空间。美国在疫情期把逆周期宏观政策工具利用到极限，如 2021 年初在经济已然快速复苏背景下仍执意追加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已发生严重通胀时继续实施零利率和追加量宽政策，缺乏跨周期前瞻性视角及过度刺激不可持续与其通胀困境不无联系。我国政策谋划同时考虑了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然而二者如何更有效配合协调，特别是如何更好处理有关未来经济走势预期对跨周期调控效果的内生影响，也有一些新的经验可探讨总结。两国交流借鉴疫情期经济干预政策经验或有助于提升各自政策有效性。

另外去年中美经济呈现镜像的客观态势，决定了两国调控干预需逆向发力，形成当下宏观政策取向的反差。美国面对严重通胀不得不“踩刹车”紧缩，我国则需“加油门”助推经济增长。日前美联储做出加息决定是其紧缩政策的最新标志。我国今年两会则传达加码积极宏调信号，包括“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动用 1 万亿元央

行多年投资收益结余，实施 2.5 万亿元财政扩大支出计划等。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宏观政策背向而行，是多年来极为少见甚至绝无仅有现象，对 G20 重视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提出了新课题。另外最新俄乌战争外部危机以及国内疫情新情况，对经济形势和政策都引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关注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⁹

黄益平¹⁰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为什么要重视现金流风险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来保经济主体，其中很主要的内容就是稳定中小企业。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的很多政策措施也是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包括减税降费、留底税款返还、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清理对中小企业的欠账等。可见，支持中小企业依然是今年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政策内容。

为什么最近关注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问题？一开始是听到一些中小企业主抱怨，最近现金流非常大。这个从宏观经济数据也能看到一些端倪，比如，今年1月，社会融资总量大幅增加，短期的融资量也增加不少，但狭义货币（M1）的增长（不做计调）却是负数，到2月才略有改善。

总体来说，我们的狭义货币增长较低，也就是意味着活钱不多，这意味着企业在短期内能动的钱不多。

通常讨论金融风险，最担心的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因为企业违约或破产基本上都是由企业的资产负债恶化引起的，很多金融危机实际上就

是资产负债表危机。

但实际上，现金流风险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虽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很健康，但由于现金流断裂，短期内拿不出钱来，同样要面临违约甚至破产的压力。

现金流危机早期在金融机构很常见。举个例子，银行收进来100元存款，发出去90元贷款，剩下10元是现金或者准备金，这本是正常的银行业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平衡的。但如果短期内存款人想取回去20元存款，银行只能说没有足够的现金，这样就容易引起存款人普遍的恐慌，甚至造成银行挤兑。1907年华尔街的银行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有一个小企业主去银行取钱，银行说现金不够，让他第二天再来取。问题是很多人听说这个消息后，都担心银行没钱，所以都急忙跑到银行去取钱，这样就出现了挤兑。本来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的一家银行就这样被挤垮了。后来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机制，包括央行的最终贷款人功能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降低银行现金流危机的风险。

去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出现债务违约，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的开发商当时都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商只是出现了现金流断裂。

9. 本文根据黄益平在2022年3月15日北大国发院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10.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2018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为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Member of The External Advisory Group on Surveillance）。

所以说，看一家企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时，除了看它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风险也值得高度关注。

今年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尤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一件全球性的金融大事——美联储加息。现在看来，美联储加息的步伐会非常快。过去的经验是，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在加息时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一定的货币紧缩影响。如果美联储迅速加息，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货币价格上升、利率上升甚至资产价格下降等问题。当然不同国家因国情不同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但基本上所有国家都会因此面临一定压力，特别是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国家甚至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流动性趋紧的可能性值得高度关注，不过我国的问题相对小一些，毕竟总体看来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比较健康、市场大、增长稳健、经常项目有顺差、外汇储备也很庞大，再加上目前对资本项目还有一定的管制。央行所提的“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有可能实现的。只是如果美联储大力度加息，那么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我国也完全有可能面临流动性趋紧的压力。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更加值得关注。

中小企业面临的三个新问题

第一，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已经大幅上升。早几年做过一个研究，观察全球危机以后国内企业的去杠杆现象。发现当时的去杠杆化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在去杠杆，但它的杠杆率相对比较稳定。2016年，“去杠杆”是重要政策之一，出乎意料的是民营企业的杠杆被严重挤压，它们的融资环境变得非常糟糕。这段经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金融环境不稳定，民营企业的杠杆率风险和现金流风险都会大大高于国有企业。

事实上，全球危机以前，国企、民企的资产

负债表大致处于差不多的水平。2017年底，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0.4%，民营企业为51.6%，说明当时国企和民企的杠杆率已经出现分化，民企的杠杆率大概比国企低9个百分点。之后，政府陆续出台了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这也是本届政府最为重视的政策之一，并且几乎每年都会会有几轮相关的政策出台。2021年底，国企的平均负债率为57.1%，而民企的为57.6%。换句话说，经过4年的政策努力，民企的杠杆率已经比国企高了。2020年疫情期间，中小企业信贷总量增长了30%，这无疑是源自很强的政策支持。经济不好，但中小企业融资却逆势增长。2021年，中小企业贷款再度增长25%。

上面的数据揭示了两件事情：

首先，过去几年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中小企业的杠杆率上来了。但是杠杆率高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中小企业想借钱能借到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压力会比较大。如果经济不好，杠杆率又高，那么企业现金流的压力就会增加。

其次是出现一个新问题，现在中小企业的融资每年增长25%—30%，如果要继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的扶持政策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总之，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当企业的杠杆率上升后，企业又会面临还本付息的问题，因为钱毕竟都是借来的，是要还的。

第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然较高。虽然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比国企没有高太多，但民企还本付息的压力却比国企高很多。据官方数据，去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为5.6%，国企的为3.8%（以LPR为准）。如果看真实利率即名义贷款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两者的差距就更大。

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处在制造业的中下游，它们的产品价格就是消费者价格。去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0.9%。如果把民企5.6%的名义贷款利率减去0.9%，那么中小企业的真



实贷款利率是 4.7%。作为对比,大部分国企都在制造业的上游,它们的产品大多数是生产品,它们用生产者价格来做利率折扣。去年的 LPR 利率(贷款基础利率)是 3.8%,PPI(生产价格指数)是 8.1%,因此国企的实际贷款利率为 -4.3%。

如果看名义贷款利率,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 1.6 个百分点。如果看真实贷款利率,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 9 个百分点。

第三,应收账款的账期显著延长。所谓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款项。有调查发现,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平均账期由原来的 30 天变为 90 天。直观地猜测,大概是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中小企业的谈判能力大幅减弱。去年春节前,有不少中小企业主在催收账款这件事上耗费了很多精力,账收不回来,没钱给工人发工资,企业容易出问题。太使劲地催收,容易得罪大客户,将来没有订单,企业活不下去。

据估计,2020 年底,全国应收账款总额为 14.7 万亿元,这个数字与当年中小企业贷款总量 15.5 万亿元几乎相当。也就是说,政府鼓励银行发给中小企业的这些贷款,几乎全部被大企业扣了 3 个月,被免费占用。更有意思的是,有调查发现,这两年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容易被拖欠,但大企业的应收账款账期反而缩短了。对中小企业来说,因不能及时收回账款,如果要想继续开展业务,只好去借钱,这样既提高了企业的杠杆率,也增加了资金成本,还会进一步提升现金流的风险。

政策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一些措施可能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现金流的风险,包括减税降费、增加融资以及清还欠款款项等。

与此同时,还可以再想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政策措施,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压力:

第一,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过

去几年,政府一直在要求金融机构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但这主要基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命令。在疫情期间采取这样的政策,可以理解,但不可持续。金融决策最重要的是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企业的风险越高,其融资的成本理应越高,否则将来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因此,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持续地要求银行人为地压低贷款利率,而应该更多地考虑货币政策宽松或者财政贴息。

第二,缩短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账期。应收账款本身是企业之间的事情,但如果拖欠账款的主要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那么政府出台一些引导性的政策对解决问题会有帮助。比如政府可以提出一个大致合理的账期(回到疫情前的 30 天左右);再比如在对大企业做征信分析时,要看它是不是经常拖欠中小企业的款项;再比如鼓励大企业将应付账款账期作为其社会责任(ESG 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标准)一个重要内容,主动定期地向社会公布。

第三,直接向中小企业发放补贴。疫情期间,政府鼓励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及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问题是,有意愿去贷款或者能够从减税降费中获益的,都是经营状况还不错的中小企业。那些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中小企业,既没有贷款的意愿,也因交税较少而无税可减。因此,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要保经济主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没有可能借鉴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做法,直接向中小企业发放补贴,而企业一旦在今年稳住了,明年也就好过了。

综上所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问题值得高度关注,现在企业的杠杆率已经比较高,如果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流动性状况造成一定的冲击,流动性压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如果能未雨绸缪,采取一些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风险,对于稳定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答 | 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与前景¹¹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锋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卓¹²

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卓：由于疫情防控的关系，今天媒体朋友无法到场，但我们在线上向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我来代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2022 年中国设定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底气是什么？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

林毅夫：设定 5.5% 的增长目标，我认为底气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空间非常大，只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按比较优势做得好，国际市场还是有需求的，国内也有进口替代的空间；再者，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企业更有竞争力，能创造就业，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就能增长，需求也能增加。这是底气之一。

第二点，要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当然需要投资。从投资方面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依然高达 45% 左右，投资资金的潜力很大。政府的财政状况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占 GDP 的比重是 60% 左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也还都相当大。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有利的条件用好，实现 5.5% 左右的增长目标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努力接近 6%。

这样的增长目标对于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比重已超过 18%，中国经济增长达到 5.5%，对全世界每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一个百分点，应该能占到全世界增长的 25% 左右，所以中国仍是对全世界经济增长

11. 本文根据林毅夫、许宪春、姚洋、卢锋、黄益平五位学者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北大国发院第 60 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上的对话和问答环节整理。本环节由黄卓主持。

12. 黄卓：北大国发院副教授（长聘）、发树学者、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贡献最大的国家和最主要的动力源。

此外，这个增长目标对中国 2035 年远景目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因为中国希望到 2035 年人均 GDP 在 202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就要求从 2021 年到 203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达到 4.7%。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下，如果能达到 5.5% 左右的增长，也有利于 2035 年远景目标，这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上分两步走的关键一步。

黄卓：下面的问题请教姚老师。您提到给老百姓直接发钱的效果要好于发消费券，但也有担心说如果发钱，老百姓存起来不消费，怎么解决？

姚洋：看一下我们国家收入分配的状况，收入最低的 50% 的人，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只有 16%，其储蓄微乎其微；收入最低的 10% 的人，基本上在负债消费。所以，至少对于收入最低的这 50% 的人来说，不存在给了钱会增加储蓄的问题。如果大家担心这一点，那就只给收入最低的 50% 的人发钱，每个人两千元钱，其他人不发。

另外，因为现在可以发放有时间标签数字货币，比如要求发钱之后在 3 个月内花完，不花完这笔数字货币就自动作废。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账户，“这钱是给我花的，我就应该花掉”。对于很多本身消费能力很低的人，这种担心没必要。

黄卓：下一个问题给许宪春老师，您这几年特别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的测算统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数字经济非常重视，专门讲到要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想请您谈一下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数字经济下一步会在哪些领域更好地发力？

许宪春：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发达国家，都制订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许多重要会议上都阐述过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在近几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十四五”规划纲要就“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设立了一篇，就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规划。

美国经济分析局对美国的数字经济做过测算。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美国 GDP 的 7% 左右，但后来又增加了云计算等一些领域，使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9% 左右。我们按美国同样的方法测算中国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6% 以上，略低于美国。尽管和美国相比还存在差距，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前面。

关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交易、数字化媒体等领域发展得比较好并有很大的潜力，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市场。

但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范围、分类和测算方法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到底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范围如何界定，数字经济如何分类，数字经济增加值如何测算，都还在研究过程中。数字经济统计与传统经济统计不一样，传统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基本上都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林毅夫老师常讲，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与经济发展的中心密切相关。统计理论和方法也是如此，当经济社会走到前面的时候，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者就有机会总结、梳理、提炼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我国和欧美国家几乎同步，这给中国的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者提供了一次总结、梳理、提炼数字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黄卓：下一个问题给黄益平老师，去年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险让人比较担忧，今年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很大，近期中国 A 股和港股大跌，整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也比较明显，今年中国金融市场应该重点防范哪一类的风险？

黄益平：应该说从 2015 年以来我们国家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地方都发生过一遍了，当然都不是很严重，最后都稳住了。这说明我们的经济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的金融稳定其实主要是靠政府兜底来稳住，但现在完全靠政府兜底变得越来越困难，面临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注：是指对一个国家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者不可同时兼得）。

一方面，增长减速，这意味着会有一些企业要失败，面临一些结构调整，风险会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的杠杆率总体来说已经比较高，再加上政府全部兜底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所以政府提出“要尽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非常准确的。

至于说风险具体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经济学家的预测并不总是靠谱。去年我最担心的是一些地方的区域性金融风险，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确实有些地方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然，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平台跟政府的信用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太可能出现所谓的“明斯基时刻”（注：资产价格崩溃的时刻，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但确实有一些风险。我去年第二担心的是中小银行会出现风险，因为这些年给中小企业发放了很多贷款，里面可能存有一些问题。2020年、2021年，这些机构都冲销了不少坏账，现在还有一些债务正在前移，所以这个风险还没有完全过去。去年出乎我意料的风险是房地产开发商。

今年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重点是美联储开始加息，这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一般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时，全世界都觉得受益，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市场利率下降、资产价格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意义；但等到美联储反向操作时，对其他国家就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当然，中国的情形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太一样。

黄卓：下一个问题给卢锋老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CPI涨幅要控制在3%左右，去年这一目标控制也是3%，但最后全年下来只是

0.9%。今年俄乌冲突使得很多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您怎么看今年的CPI涨幅目标压力？

卢锋：去年我国PPI处于多年高位，但是CPI是0.9%，核心CPI是0.8%。去年CPI走势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如猪肉价格走低等影响，不过总体看，无论跟我国疫情前CPI增速比较，还是与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比较，都是一个在宏观经济面临三重压力背景下的偏低CPI水平。在这个背景下，今年两会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预期目标，意味着今年消费物价有望显著回升。

我理解上述通胀目标含义是要通过稳增长，使得总需求得到较快恢复增长，然后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注：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的经验关系，使得通胀能够改变目标偏弱状态。

因而这不单纯是价格或通胀问题，当然也不是要通过大规模货币放水打高价格，而是要针对现实问题，通过合理实施宏观政策、优化监管政策和推进必要改革，对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扶持，使得经济更好地复苏增长，同时控制外部输入性通胀的过度影响，从而使得物价和通胀能够达到和维持比较正常合意的水平。

从政策的角度，今年宏观政策方针意图比较给力。两会制定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方针，财政政策要动用1万亿元央行多年投资收益结余、支持今年2.5万亿财政扩大支出的措施。具体评估虽然学界有不同探讨，比较起来积极政策取向比较明显，今年1-2月经济数据呈现某些亮点。

然而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下一步实现经济稳增长目标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如最近国内疫情变化要求升级防控措施，上海、深圳都针对疫情形势追加采取了较严格的必要管控措施，要知道这两个超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即便是较为短期减速也可能有显著影响。即便通过努力快速控制住这一波疫情，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状态也还有待观察。



另外，行业监管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以增强预期仍需时日，如何优化既定政策方针，也是需要观察评估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看，俄乌冲突导致了外部环境急速变化，有可能通过大宗商品、贸易、金融等不同渠道对全球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我国也难以完全屏蔽。

今年中国与美国宏观政策取向不同，这个少见形势会带来什么影响不确定性较大。两国背向而行实施宏调政策潜在具有一些有利因素，如美国经济增速回调，边际上减少资源需求，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复苏对资源需求。反过来，我们如顺利稳增长，对美国外需增长客观上也是有利因素。不过，最新俄乌战争危机以及国内疫情新情况，给经济形势和政策都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是全球主要货币发行国。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会通过全球范围流动性紧缩带来冲击。我国经济和金融基本面较好，具备比较有利的应对冲击能力，不过流动性短期变化是否会在某些局部引发意想不到的情况，也是需关注的问题。另外，我国作为多边机构重要成员国，在一些双边场合也有较多承诺和责任，还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债权国，在全球金融不稳定形势下的风险会增加。

综合考虑，CPI问题不简单是能否实现特定物价目标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实体经济和金融方面能务实有效地应对目前面临的内外新矛盾，实现宏观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问题。这些方面如果做到位并且成效好，合意通胀目标自然会实现。

问：请问许老师，您提到行业增加值在2021年从年初到年末有所回落，为什么分行业的增加值增长率会回落这么大？有些能从20%多回落到负值，什么原因？

许宪春：的确，2021年若干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非常大。有三个比较突出的行业：

第一个是制造业。2021年一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6.8%，四季度增长3.1%，增速回落了23.7个百分点。为什么回落这么快？实际上制

造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发生在2021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二、三季度主要是受一些偶发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汛情、煤炭短缺、电力短缺、芯片短缺，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过大。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承担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21年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有所回升。今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到7.5%。我认为去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是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第二个是建筑业。2021年一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增长22.8%，四季度下降2.1%，增速回落了24.9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和投资密切相关，因为2021年投资增速回落得比较快，特别是四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负。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全年只有0.4%的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十个月回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传导到建筑业。

第三个是房地产业。2021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21.4%，四季度下降2.9%，增速回落了24.3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受房地产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的影响。

这三个行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背后都有重要的原因。这些行业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影响到GDP的增速。2021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18.3%，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4%，增速从一季度的18.3%到四季度的4%，回落了14.3个百分点。

问：黄老师特别提到对于拖欠账款的这些企业，可以采取一些征信措施，但它们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订单减少等问题，并非主动拖欠账款。想请教黄老师，在国内大环境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让大企业压缩账期的方法是否可行？您对于企业拖欠账款的动机怎么看？

黄益平：这个问题很好，但很难回答。中国

在1990年代确实发生过“三角债”问题，就是企业相互拖欠债务非常严重，中央银行和政府下了几次决心，最后也很难化解，相互之间拖欠太多太久，纠缠不清。

我的基本假设是主要问题在于大企业拖欠小企业，而大企业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充裕。为什么账期一下子延长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以后经济形势变差，小企业对大企业的谈判能力大降，大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也受到一定影响，但如果有免费资金可用，它们当然想用，这是我了解的一个基本情况。

不过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也存在，大企业自己也有欠账要不回来，或者被拖的压力，中小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情况也不少。但这个问题总要解决。在建议一些政策措施时，我坚持两点，一是不能强制；二是总要有个突破口。我认为让条件好的大企业通过征信和社会担当，主动压缩账期就是可行的突破口，对总体化解这个问题有帮助。

问：林老师讲到发达国家通常的增长率是2%-3%，中国增长率高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利用了创新法宝，即“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的发展动力和信心受到影响怎么办？怎么恢复？另一方面，国际上原来对中国这一模式比较开放，如今大大提高了防范之心，怎么办？

林毅夫：信心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在政策上过去有一段时间对增长的强调不够。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首先明确地强调稳增长，并且把过去常讲但是近来没有什么声音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突出出来。有这样的政策导向，并且配合一些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创新政策等，我相信大家的信心会恢复。因为企业家总是有发展的意愿，既然我们还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而且可以投资的钱其实也不少，只不过因为过去大家觉得增长不重要，也不鼓励投资。即便鼓励投资，也主要去鼓励那种发明式的高新产业投资，发明的机会当然有，

但相对来讲很有限。从数字来看，我们现在能够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只占整个制造业的15%，剩下85%是大头，其创新、升级靠后来者优势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不被鼓励，但却是我们增长最重要的生力军。所以我今天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一点。

当然我很高兴看到政策在变化，随着政策变化，我相信这个信心就能增强。

外国会不会制造障碍防范我们将“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的来源？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这些新技术在发达国家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取得突破，取得突破以后能有多大的利润则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正是最大的市场。其实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时，绝大多数情况是购买更好的设备，因为更好的设备里含有新技术，那就是技术创新；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产业也要购买更好的设备，就能进行产业升级。现在国外拥有这样技术的企业，会表示不卖给中国企业吗？如果不卖给中国企业，它很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亏损。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不会存在（把已经发明出来的、有市场、自己能赚钱的技术不卖给中国企业）这种情况。

唯一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就只有一个为了维持政治霸权宁可牺牲经济利益的国家——美国，但美国拥有的技术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一家独有，欧洲的德国、瑞士、法国，或者亚洲的日本、韩国可能也有。美国不卖给我们，正好给其他国家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这种状况下，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说，并不愿意封锁中国企业，因为有非常大的风险。例如第一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是华为，华为非常依赖高通的芯片，如果没有高通的芯片，华为就不能生产5G手机。但问题是，高通如果不把芯片卖给华为，也是死路，究竟是华为先死还是高通先死都不好说。所以去年高通又跟美国国务院申请同意其把芯片卖给华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卡中国脖子事情不会发生，但能发生的领域非常小。只要我们能继续保持增长，并且继续开放经济，在绝大多数正追赶的领域里还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而且这样做的成本会比自己发明低。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华为的任正非，他说，对我们“引进-消化-吸收”的这些技术，我们要清醒、要跟踪、要有备胎，避免被卡脖子，但是，只要买比自己生产便宜，那还是要买。

如果有任正非这样的开放态度，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大量地利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服务占比85%的制造业，不管从就业角度，还是从GDP占比和经济增长的角度都是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我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问：请教姚老师，您今天讲到刺激消费，尤其是给中低收入群体多发钱，这或许能够解决当下的消费问题，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不高是个长远问题，需要通过教育公平提升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等等，您觉得解决这个长远问题的关键

是什么？

姚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太可能提高收入能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何让收入分配更加平均，这也是个大问题。收入分配是个极慢的变量，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7，到最高峰超过0.5用了30年的时间。这是个比较缓慢的过程。现在我们说要降低基尼系数，如果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能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具体说到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能力，我想在教育行业有很多事可以做。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非常不平均，大概是我国分配领域最不平均的地方。这一方面跟老百姓重视教育有关，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学校去，所以好学校就会集中资源；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和政府过去这些年忽视这个问题有关。要讲清楚这个话题可能很复杂，我的总体态度就是有很多措施可以去实施，让教育资源分配得更加公平。



站在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¹³

余森杰¹⁴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背景，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该表述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提法一脉相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到的是目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即经济的三期叠加，其主要含义是，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实际上，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三重压力，都意味着目前的经济面临一定的挑战。

那么面对挑战，新的一年经济工作又该如何做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字大背景是什么？

要做到“稳中求进”，首先要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大背景。

需求收缩的大背景是从2008年到2016年之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购买力下降，各国的收入、发展增速没有之前那么快，而中国经济之前主要依靠外需来推动，从而导致整体上呈现需求收缩态势。

但最近几年，尤其是2021年的需求收缩主要体现在国内。这一年中国面临的外需仍较为强劲，该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4.4万亿元左右（创历史新高——编者注），而受疫情冲击影响，一些企业发展相对较慢，生存压力较大。换言之，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得较为缓慢，恢复内需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客观上存在内需收缩的可能，拉动内需成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贸一体化中。虽然2021年中国的出口不断上升，但上游产品价格提高，导致进口价格升高，使得经营外贸领域的企业利润并没有变得更多，

13. 本文为《商学院》杂志2022年2月对余森杰的采访整理。

14. 余森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甚至可能变得更薄。这是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主要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这一判断则基于我们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百年不遇的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面临一定发展压力或需求减弱。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出台了許多贸易保护措施，使得目前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另外，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中，对各国经济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基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需要通过政策“组合拳”来实现，包括宏观、微观、产业、结构、区域、卫生健康、社会保险等各方面政策。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上述三大压力，但仍然可以看到机会和挑战并存，危机中孕育着新机。随着经济“蛋糕”逐渐做大，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入市后的黄金十年客观上有所下降，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是拉动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8.1%以上，远高于6%的预期，这说明中国经济是有韧性的。

多方面理解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本质上说，这不同于之前的粗放式发展。

粗放式发展形态下，资本、劳力、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被投入进去，随着生产要素增加，产出会上升，再加上原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整个经济自然会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但应当看到，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增长速度是难以持续的。

原因有两点：一是要素投入不可能持续增加，要素回报会出现边际递减特征；二是从统计原理上说，随着经济“蛋糕”做大、GDP基数增加，

分母基数就在增大，同等情况下，分母越大结果越小，体现出来就是经济增速下降。

在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速的实现主要靠集约式增长，集约式增长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之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以从微观到宏观表述为六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如今国际贸易中存在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大类产品。相较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更高。如今，一般贸易的比重已从过去的50%提升到65%以上。在加工贸易中，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原来附加值最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附加值较高的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光学仪器，特别是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

第二是体现在产品质量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从出口品的质量提升方面来看。数据显示，出口品质量从2001年到党的十八大之间，质量提升了30%左右，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又提升了25%左右。由此可见，出口品质量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第三体现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2001年入市为基数，到党的十九大之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提升了50%左右，同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也达到了美国的一半，也是很明显的提升。

第四体现在拥有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中国具有联合国所列出的工业门类41个大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在全球是唯一的产业完整、设备、门类齐全的工业国家。

第五体现在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产业集聚特色。中国每个工业城市都有自己主打的拳头产业和工业名片，如东莞的机械和电子、汕头的玩具、廊坊的木材和邢台的羊绒，每个城市都有其鲜明的产业特色。

第六体现在三大产业比重呈现出新特点。如

今中国三大产业发展比重显示，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7.5%左右，第二产业占37%左右，第三产业占53%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的西方国家相比，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较高，这是个较明显的特征，体现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特色，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良性作用。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和减税降费？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着重提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其中包括共同富裕、减税降费等问题。那么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和减税降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毫不动摇的。但需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下，共同富裕的要求、内涵、实现方式、途径都会有所不同。

共同富裕并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劫富致贫。其实现方式是首先进行初次分配，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把“蛋糕”做大；其次是再分配，通过财政税收、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

的合理分配；三是通过道德力量劝说先富起来的群体做出更多的社会贡献、捐献。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蛋糕”做大，在做大基础上做好“蛋糕”的分配工作。换言之，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目前阶段还是效率优先，同时完善为实现公平而配套的各种财政、税收、社保等建设工作。

如何理解减税降费？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三大支出领域的结构调整，实现逐步由原来依赖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转向为依赖内需（即消费）这驾“马车”。要提升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做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只有如此，居民才有能力、有意愿去扩大消费，而这需要降低初次收入中居民所担负的税收和费用。这是减税降费的重要意义，最终目的是拉动内需。

实现减税降费，伴随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矛盾点在于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必需投入，导致政府支出不变甚至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减税降费，就需要通过赤字财政或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这也是我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力，尤其是财政政策靠前发力的原因。



不能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解释短期的经济下行， 不能轻易放低 GDP 增速目标¹⁵

余永定¹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我简单谈几点。

首先，我们要对 2021 年的经济增速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 8% 以上，但如果去掉基数效应，实际增速可能低于 5%，低于潜在增速。虽然我不相信任何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一定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收缩状态，PPI 自 2012 年 3 月起连续 54 个月为负增长；CPI 在过去 10 多年基本不超过 2%，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往上涨，但最近又往回降了。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有时通货收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我们应该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相当高的令我们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它任何目标都难以做好。

顺便说一下，所谓“高质量的 GDP”的提出用意是好的，这个表述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质量高或低属于微观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的问题，100 亿元的 GDP 就是 100 亿元的 GDP，不能说现在的 GDP 虽然比较少但是它的质量比原来的高。企业不顾质量盲目生产的问题是有的，但这是产业层

面而不是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

我们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绝不意味着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我们只是强调，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就应该努力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条件。反之，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

我们不妨看看 2019 年和 2021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同比可能涉及到基数问题，我们简单看一下环比。

2019 年各季度的年化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 6.6%、4.9%、5.3% 和 6.6%，2021 年前三季度的年化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 0.8%、4.9% 和 0.8%（第四季度的数字还不知道）。由此可见，2019 年和 2021 年之间的差距相当大。2021 年的经济是在增速低于 6% 的情况下运行的，充分说明我们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增长问题。

如何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学界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存在许多方法论上的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经济就无法增长；或者认为，如果追求经济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这是把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15. 本文根据余永定在 2021 年 1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上的演讲整理。

16.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想问，这个“结构性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在经济学家们的文章中，人口老龄化、投资 - 消费 - 出口在 GDP 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导致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这一箩筐的宏观经济之外的问题，都用一个叫“结构性问题”的词装在了一起。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由于这样一些结构性因素存在，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这么低。

金融危机之后，2010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 12.2%，此后几乎每个季度都在降。如果说从 12% 降到 10% 是结构性因素导致，我可以接受，那么从 10% 降到 9%、8%、7%、6% 甚至 5%，都说是因为结构性因素，我就认为不合适了。结构性因素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它是长期的影响因素，经济增速每个季度都在往下走，就不能用长期的慢变量来解释。

我对结构性因素有以下四点评论：

第一，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里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它对每年、每季度经济增速的影响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如前面列出的那些结构性因素，它们不仅数量庞大，且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但总的来讲，单个的结构性因素在较短时间内对 GDP 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第三，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讲它使得经济增速下降了，但我们还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就是抵消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吗？我们要看最后的结果，而不是说有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一定低于 6%

或者 5%。

第四，什么结构性因素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另外一些结构性因素，则是通过非常长的因果链条影响到消费、投资等。如果你要想证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只能是 6%，那你就得把每一个因果环节都给点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影响了 A，A 又影响了 B，B 又影响了 C，你得把 ABC 找出来；如果你根本找不到，然后你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速只能是 6%，那我觉觉得这不能成立。

宏观经济讨论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假定那些结构性因素是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

比如消费为什么下去了？这跟人口老龄化可能有关系，但恐怕直接的原因并不是这个。2020 年很多人主张像美国那样，通过政府给老百姓发补贴来促进消费。这肯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消费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预期很悲观，即便你发了钱他也只会存起来。2021 年好多人讲消费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增长，其实可能性不大，如果经济不能够真正增长起来，不能使大家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大家的预期，消费增长就会很困难。

再比如人口老龄化对 GDP 的影响。人口因素确实与经济增长速度有某种相关关系，但不见得是因果关系。日本在 60 年前的经济增长率超过 8%，现在低至 1% 左右。与此同时，日本人口也快速老龄化。这是一个长达 60 年的过程。老龄化肯定对日本的经济增速有很大影响，但将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摊到每一年来看，在每一年这种影响很小。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值得重视，我想说的是，在分析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判断一下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一点，通货膨胀



起来了，或者会产生金融危机了，那说明经济增长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现有水平甚至还要再降低；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发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追求更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这是经济学界的方法论出了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老想着预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然后根据预测的结果来决定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把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算准了。中国更是如此，很多时候连基本的统计材料都没有。国家统计局在不断调整修改统计资料，美国也是，多年之后再对之前的主要经济指标做调整，可能调整一个或者两个百分点，但总共才三个百分点，这样的宏观经济预测到底有多大意义？

我们研究经济学有几十年了，碰到过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有人预测准了，但他可能一辈子就蒙准了那一次。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他大概就预测准过这么一次。还有位美国经济学家 90 年代初就预测美国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 20 年后终于发生了。有人说，“只要你坚持一个预测，永远说下去，你总要准一次”，但这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预测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认为它就是真理，就非得按照这个去做。

我特别欣赏过去的中国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搞不清楚前面是什么，大方向看准了，那就边走边看，这里面蕴含了相当多的道理。有些管经济的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比懂经济学的管得好，这是事实。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中国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达到了年均 10%。中国的 GDP 在刚改革开放时排名世界第 18，小于荷兰，但到现在让美国都害怕了。中国的 GDP 在刚改革开放时不足日本的 1/4，2010 年赶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 3 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成功了就是好的。我感觉，当初决策者幸好没听信经济学家的一些非常 scholarly（学术性的）的主意，否

则实现不了 10% 这样的成绩。世界银行在上世纪 80 年代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多预测报告，但许多都不准甚至和实际情况南辕北辙，那里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做了大量的调查。为什么会这样？我主要想强调的是，人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一种非常谦卑的心态去尝试，敢于尝试才是最好的。只要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失控，没有非常明显的金融危机风险，就应该争取让 GDP 保持更高一点的增长速度。

每年都有人在说中国面临危机。2012 年我们去纽约交流，当时美国那边就说中国要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先是说房地产市场要崩溃，然后又说温州地下金融要把中国整个金融业拖垮。我当时说，虽然这些问题存在，但是它们根本不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当时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整个中国经济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不能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它们也不会造成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种危机。

我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社会科学院，当时就在讲中国危机、通货膨胀，说笼中老虎会出来，但等了 50 年我头发都白了，这些危机还没等出来。如果那时候小心翼翼不让经济增长了，那中国肯定不会有今天。所以我觉得，经济学还不是一门十分严谨、十分确定的科学，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艺术性。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要用试错的方法，追求一个比较高的经济目标，而且我们有潜力和能力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6% 以上。

2022 年大家认为是 5.5%，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毕竟还在受疫情冲击。我们应该有个目标，我不赞成不制定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引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要有个目标，这样大家才会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在制定每项政策时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说出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明确提出一个目标，大家再根据这个目标来协调行动呢？同时，这个目标定得也不要太低，我们用试错的心态去尝试，确实不行后再退回来也不晚，避免出现所谓的“经济磁滞效应”。一个人老失业，再就业就

可能不适应，而一个团队因经济情况不好解散了，再组织时可能就没人气了，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所以我们应该就经济增长目标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的主流

研究人员和北大的主流研究人员的想法非常接近。我们需要多交流，大家也要把想法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实现百年目标做出一点微薄但积极的贡献。



房地产政策短期松动不改长期趋势¹⁷

赵波¹⁸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今天我谈的主题是“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突飞猛进地发展，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年的数据，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46平米，住房拥有率83%。根据社科院2020年的测算，房屋资产成为占居民财富比重最大的资产，总值为GDP的2.3倍。房地产本身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投资品。尽管我们现在强调“房住不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品房的资产属性。人们对房地产又爱又恨，有房的人特别希望看到房价涨，没房的人特别担心房价再涨，好不容易凑齐的首付，又买不起了。

房地产调控始终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1998年到2003年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初期。当时，我们提出，“要促进房地产成为新的增长点”，“房地产的带动力强，关联度高，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随之而来的是房价过热。从2004年到2007年，政府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国八条”、“国六条”，上调房贷利率，四次加息，货币政策从紧。在这次调控很关键的时候，全球次债危机爆发，在外部环境压力下，2008年中国的地产调控政策由紧转松，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4万亿”刺激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实行了宽货币的政策，广义货币M2增速增加，大量的资金

流入到房地产、基建领域。

2010年到2013年，中国陆续出台了“国十条”“国五条”，实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首套房、二套房、三套房差别化的信贷），多次增加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贷款基准利率。2016年之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控周期，政府提出了“房住不炒”、租售并举，保障房建设，发展长租市场，这是目前来看最长的一个调控周期。

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上半年，中国降准、降息，地产纾困，所以出现了短暂的窗口期。从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三条红线”以及房地产贷款的集中管理，从资金的来源上对房地产投资进行了大量的限制。刚刚过去的这一两个季度，中国面临着稳增长的压力。从第四季度开始，实际调控政策执行略有松动，家庭方面，放款周期在缩短。企业方面，过去强调的“三条红线”也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一个非紧的约束。

总的来说，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住不炒”，房地产调控进入了常态化的调控时期。过去地产调控非常强调需求端政策：限购、限贷、交易税、契税、所得税、房地产税等，以强化需求侧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所有这些政策不能说都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但是客观上对于需求端对房价的调节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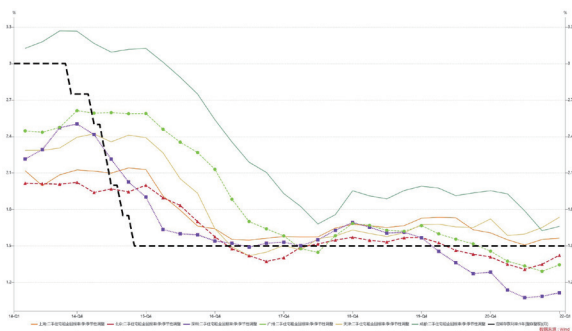
供给方面的调控政策过去强调得不是很多。

17.本文根据赵波在2022年3月15日“2022网易方向大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18.赵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

中国特定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城市的土地归国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政府作为土地市场上最大的供应者，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供给政策的调控包含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发展长租市场，以及住宅用地集中供应等。

2016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究竟有没有实现稳房价的政策目标？我们比较了主要几个大中城市住宅的租金回报率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果你买了一套房子，只用于自住或出租，那么它每个时期的租金，除以同一时期住宅的价格，就等于住宅的租金回报率。



如图 1 所示，在调控的初期（2013-2014 年左右），北、上、广、深、成都、天津这 6 个城市住宅租金回报率都显著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换句话说，如果这套房子你不打算卖，只是出租，那回报率还不如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人都是理性的，为什么要买一个回报率这么低的资产？原因很简单，租金或者自住不是购房者购房的唯一目的，购房者还看重的是未来资产的增值。在“房住不炒”提出后，这几大城市的租金回报全部在向存款利率收敛，有一些城市的租金回报率甚至已经超过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唯一偏离较大的是深圳。

房地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趋势

关于房地产长期趋势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在不断提升。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21% 增长到 2020 年的 6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45%），这一比率相当于美国的 50 年代，日本的 60 年代，意大利的 70 年代，韩国的 80 年代的发展水平。如果中国 GDP 按照年均 5% 的增长，中国按照购买力均价的人均 GDP 现在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水平，大概还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在 2032 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会进一步提高到 75% 左右。第一条是增加地产需求的因素。

城镇化率对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销售有正向影响。但年轻人或者农村外出就业人口进入到城市里面，他们购买力是低的。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这部分的需求如何被满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要提高租房市场的效率，房地产市场要给新增城市人口提供更多的租房供给，不是让房子空置着。房东有了租金，慢慢地会增加储蓄，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给新增城市人口，然后改善自己的居住水平，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会良性循环起来。

2. 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 1.3。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到 2050 年，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进一步加深，65 岁以上人口与 15-24 岁人口之比将从现在的 1:1 变为 3:1。这个人口结构的转变，会对房子的需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的微观数据，户主年龄与房产面积有一个倒 U 型的关系，40 多岁中年人对房产的面积需求最大，因为有孩子同住、要改善住房等需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房产的面积需求会慢慢下降，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了。对老年人来说，住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不会是最优的投资方式。人口结构这一变化会对社会的住房需求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3. 房地产企业兼并和重组增加、行业集中度上升。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 1998 年到现在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过去那种只要能拿到地、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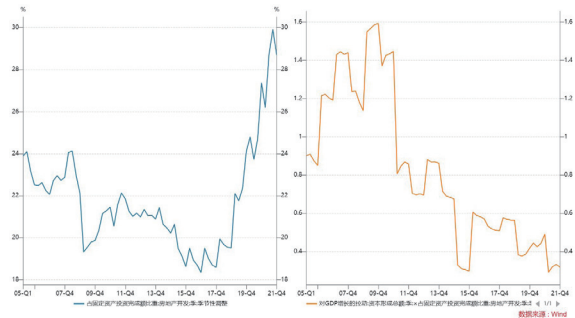
贷到款就能做房地产开发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规制杠杆率，以及对影子银行等表外资产的监管会常态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房地产的资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要多少给多少。信贷的收紧会促进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集中度的上升。实力强的、资金充裕的房地产企业，会通过兼并收购这种交易行为完成他们自身的成长。截至 2021 年 12 月，房地产销售额前五家、前十家、前一百家的房企，销售额占比分别是 16%、24% 和 64%，销售面积分别是 13%、19% 和 42%。越是规模大的企业，越注重质量，所以它的房价均价会高，使得销售额占比高于销售面积占比。

就房地产业今年的发展来看，短期内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例如北京、重庆、东南沿海城市的房地产调控都有松动迹象。2022 年至今已有 55 个城市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了调整，内容包括降低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放宽公积金贷款等。从房价变动城市个数来说，经过去年第三、第四季度的下降，2022 年 1 月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在增加，可能二、三月份数据出来之后会更明显。

短期内调控政策的放松和楼市的回暖，是不是意味着会出现自 2016 年以来楼市调控的一个新拐点呢？我的观点是不大可能，短期的这种松动不改变房地产调控的长期趋势。目前政策的有所放松，一方面对于过去一段时间一刀切式地产调控政策的纠偏，另一方面是出于短期稳增长的目的对于政策力度做了一定的逆周期调整。

谈一下我个人对于房地产结构性改革的看法。房地产结构的调整大方向目前还是很明确的，房住不炒，要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要稳定房价预期，让房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手段上通过长租、公租房、保障房等多层次市场来建立一个立体的房地产市场，目的在于减少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投资，使得资金进入到那些有充分生产力进入的行业。传统的房产开发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创新，靠地产投资虽然能一定程度刺激投资的规模，但对于人均

收入的提高的作用在不断下降。图 2 显示，虽然房地产投资占比在逐年上升，但对于我国 GDP 增长率的直接拉动作用在不断下降，目前对 GDP 增长率的直接贡献不到 0.4 个百分点。中国需要更多高质量的、高全要素增长率的投资来填补由于地产投资下降带来的空缺。



我国房地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结构性改革存在着许多阻力：

第一，从需求来说，家庭方面投资手段的单一。目前问老百姓买什么，很可能还是买房子。中国的老百姓除了股票、基金和房地产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渠道去投资。而股票分红低、风险大，对于缺乏对冲手段的居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项。企业方面，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低，主要还是通过银行借贷这种方式来进行融资。借贷就要抵押物，企业拿什么做抵押？银行是最青睐房地产企业的，因为能看到你的抵押品，即土地。

第二是房产多元属性。房产包括提供居住、投资、教育、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房产在中国不只具有居住属性，还有投资属性。房产是一种资产，尽管房住不炒，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资产属性，需要将居民正当的投资需求与房地产投机区分开来。房地产还有教育属性，大量积蓄买个“老破小”，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学位，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其他的公共服务，如医疗、环境、

交通等，也会与房屋的位置有关系。

第三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缺少收入来源，当然中央每年会提供一些转移支付，但是相对于地方的支出需求仍然有缺口，于是地方政府将房地产的土地出让作为“印钞机”，来支持基建投资和城市发展。另外，从传统思维来看，房地产有一个很强的短期的投资拉动作用，所以对于那些以地方 GDP 增长为激励的官员来说，房地产是一个见效快的刺激工具。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吸引企业短期内加大投资，既发展了当地经济，也带来了税收和就业的增长。

第四，房地产是商业银行的重要投放贷款去处。商业银行在放贷时，与其投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的私营的初创企业，不如把钱贷给房地产。现在房地产风险大了，商业银行就专门贷给房地产行业的国企，认为他们的风险最小，这是中国缺乏好的投资机会的迹象。这跟第一部分我讲的中国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低是相关的。

第五，房地产业有杠杆率高的特点。过去十年、二十年，房地产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百分之七八十。这种高负债的风险在经济上行时不会体现出来，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会体现出来。如何安全地清除这些埋藏在经济中的定时炸弹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六，经历了连续多年的 GDP 增长率下行，中国的房地产结构性改革一直缺少一个政策的窗口期。中国一方面增速在下降，另一方面又想做经济结构调整，想借助建立一些良好制度来调整房地产市场，往往有很大的阻力，比如房产税。

应对挑战的可用之策

面对这些阻力，有哪些可用的手段？我想针对前面几点分别谈一谈个人的观点。

第一，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开放资本项目，在资本项目下允许居民对外投资。目前，中国居民的投资途径过于单一，定期存款利率已经非常

低，可大家还是不得不存款，老百姓有着大量的养老、教育、医疗、购房等储蓄需求。从企业融资端来说，我们要改善企业的融资途径，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的比率，减少金融融资环节的政策扭曲。就房地产企业融资来看，目前中国推行了基础设施 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也可以探索发展住宅市场的 REITs。

第二，政府要做好公共品的提供。在现在经济学的范式下，大家已经承认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扭曲。这种扭曲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在常态化的时候还是越少用越好。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公共品，如教育、社会保障。如果教育资源能够更平均的在不同城乡、不同城市，以及城市内部之间合理分配，人们也不用绞尽脑汁去买学区房。如果居民有稳定的、可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或者有完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可能就不需要维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将房地产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

第三，丰富地方政府的融资途径和收入来源。现在我们有地方债、专项债，可能还需要丰富地方政府的税收品种，比如房产税，减少其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第四，更精准的房贷风险管理。目前银行的管制是集中的信贷管理，实际上是把居民信贷和企业贷放在一块进行管理。虽然从银行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债务，但其资产回报和风险是不同的。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贷款杠杆率比较高，而居民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主要是房地产贷款，且中国目前没有个人破产制度，所以中国居民的违约风险与发达国家是不可比的。应该对于房地产信贷做更精准的调控，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适当放开对于居民端的信贷管制，有利于目前市场上的去库存，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

第五，打破房企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预期。从恒大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房地产企业牵涉的行业和资金太多，它其实会扭曲政府的管制效果。我们在美国金融危机当中看



到过这样的情况，银行可以增加投资，不顾风险，因为破产代价太大，政府一定会来托底，就会造成一种 too big to fail。这在银行里面适用，在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也应当也适用。随着房地产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会有更大的地产企业出现。如果不能打破大而不能倒的预期，房地产企业的道德风险将会继续累积，届时对于经济的危险将不

是“炸弹”而是“核弹”了。

第六，房产税应该适时推出，哪怕先把规则制定好但是延缓推出，也比一直在试行，没有明确的政策预期来得好。当有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之后，理性人会提前做出反应，居民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将提前调整，能够起到政策不实行就已经控制房价和调节投资的作用。

数字化时代的女性领导力¹⁹

陈春花²⁰

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

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发展，并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美国曾有一个著名的“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伊州案（Bradwell v.State of Illinois）”，案中的布拉德韦尔全名迈拉·布拉德韦尔，是一名女性。她1869年8月顺利通过伊利诺伊州法律考试，9月向该州最高法院申请律师资格，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上帝设计不同性别以从事不同范围的事，从事法律工作是属于男性的事，这差不多被视为公理。当立法机关赋予本法院负责颁发法律执照的权力时，并不期望从事法律工作的权利扩展到妇女。

伴随着持续的努力，直到1892年迈拉才获得律师执照，伊利诺伊州还主动将执照的生效时间提早至1869年，即迈拉提出申请的那一年。

100多年后，职业女性的发展变得更容易了吗？

2019年我曾经应邀对《哈佛商业评论》百强CEO中女性占比问题进行过回应和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百强CEO，女性的占比仅为4%-5%。同年其他类似研究也证明，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比例为5%左右。即便延展到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中层管理者，女性的比例也都不高。即便有研究表明，从2011年到2021年的十年中，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人数占比由6%增长到16%，总体还是非常低。

女性争取职业发展其实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我们今天有机会探讨女性领导力，包括如何培养女性的卓越领导力，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女性领导者会有哪些优势、劣势，已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数字时代的新变化

我曾经用一个词来表达我对于数字时代基本状态的概括，即“触手可及的未来”。数字化时代外部的环境，完全是一个价值重构的环境，让我们如同来到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观

在新的数字时代，我们的世界观也在改变。工业时代，笛卡尔哲学作为我们世界观的基础，即部分之和是整体；数字时代，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个人、社会相互依存，必须共生。

随着我们不断地拓展新的领域和新的可能性，知识本身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称之为“知识社会的兴起”。

组织管理系统根本性改变

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系统，也发生很多根本性的改变。比如，传统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型，新型的组织是网状的、开放的。人在组织中的作

19.本文根据陈春花在2022年3月8日北大国发院与亚马逊中国合办的“数字化时代的女性领导力”主题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20.陈春花：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两次获评《财富》“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蝉联四届《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女性”。



用也因此发生了一个基本变化：传统的金字塔组织要求人对多种岗位能不断适应，所以我们培养的其实是通才；数字时代的网状组织结构要求每个人成为专家，然后大家协同做事，所以内部关系就会变成一种分工、协同的模式。

发生这些变化之后，传统的组织中人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能不能在其中找到岗位，以及纵向不断晋升，到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组织当中，人的压力和发展要求更多地来自有没有专业技能、能否在不同方向发展，这样人也不会陷入固化和僵化。当然，混乱变化和动态不确定性本身也是一大挑战。

总之，组织的变化已经呈现，而且在多个维度产生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变化。

价值重构

我们过去的研究也发现，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其基本的价值重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根本改变：

1、从管控到赋能。组织更在意能不能为员工提供帮助，并赋予其成长能力。

2、管理结构由科层制转向平台化。组织架构更关注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及授权和利他。

3、管理的绩效和效率来源，从分工转向协同共生。组织管理更重视协同带来的大系统效应，尤其是共生所带来的共创、共享以及利益分享。

4、组织目标由明确的时间绩效目标到兼顾人的意义。今天的组织管理，会在意两个部分，即绩效目标的实现和人本身的激活。

5、知识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关键变量，知识革命带来新兴领域出现，要求企业组织有学习能力，我将其称为“学习者掌握未来”。

基于这些改变，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完全不一样，以三个关键词概括的话，以前是命令、控制、信息，数字化时代已经变成赋能、共生、协同。

数字时代，女性特质蕴藏新能量

这些变化对管理者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对女性领导者的要求也不同。

数字化时代更强调在一个数字与物理融合的新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更加协同、依赖、相互依存，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也更依赖于对知识、对未来创新的理解，以及创造的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绩效更取决于技术、创新与协作。这时，女性身上的特质，比如善于沟通、关怀他人、协调和成就组织目标，有可能会成为职场的优势。

很多研究也告诉我们，在对女性的绩效评估中，亲和力、同理心、助人为乐和奉献精神等词汇出现的概率，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因此，当组织绩效来源于创新和协作，并且激励个体让人变得更有意义，我相信女性领导者的特点会使得这样组织的绩效得到更好发挥。

德鲁克曾说过的这句话，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心，他说“时代的转变，正好符合女性的特质”。

女性要敢于成为卓有成效的领导者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想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就必须清楚到底什么叫做领导力。

领导的定义很明确，就是影响他人，按照领导者想做的去做。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来讲，那最不会说话的婴儿其实最有领导力，因为他想做的一切事情，都不用说话我们就帮他做了。也可以说，人的天赋中应该是有领导力的，但是为什么长大了之后，更多的人丧失了领导力？

我有时候也看一些女性从业数据。我本人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木兰汇基金会，联合成立了一个关于女性领导力提升的教育项目“木兰学院”，目的是想培养非常多的中国女性

企业家或创业者。在这个项目中，我有机会跟很多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交流，这也是发现她们身上有很强领导力的过程。

可是为什么到了高阶管理者，尤其到 CEO 这个位置，女性的比例就只有 5% 左右？答案有时候可能是社会没有提供这个机会，也可能是女性自我选择了放弃。

做自己的领导者

如果我们知道天赋里就有领导力，那么成为领导者的核心就应该自我造就的过程；如果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成为领导者，哪怕具备天赋或天性，我们也不可能成为领导者。

能否成为领导者，首先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持续挖掘、持续学习。而要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首先要成为自己的领导者，要认识到领导力其实是一个自我造就的过程。因此，我鼓励很多女性管理者、企业家要不断地学习和超越自己，要有说服力、能驾驭变化，以及更有定力，持续洞察变化，不断地对自己提要求，通过自我造就，成为自己的领导者。如果可以成为自己的领导者，就有机会成为卓越的领导者。

做卓越的领导者

要真正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可能需要四个方面的能力或训练：

1、理解管理角色承担的其实是责任而不是性别。我常被问到，女性领导者的责任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就管理者的责任来讲，男女没有什么不同，管理者的角色首先意味着责任而不是性别。不同性别的管理者，其不同在于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优势。

2、持续确信你能真正带领大家解决问题，并成为真正卓越的领导。

3、训练自己的思辨能力，不人云亦云。很多时候领导者要在各种复杂信息中做决策，而且能够真正对话、包容不同的观点，这些都源自有思辨能力。

4、能形成真正的团队，与比自己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这是成为卓越领导者需要做到的四件事情。

构建女性自身的内在定力

从女性自身而言，可能会特别在意一些概念，比如追求完美、高要求、对自己非常苛刻，甚至可能没有办法面对孤独或是冲击。这些都是女性可能有一些特征，因此我希望女性能拥有内在的定力，并希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训练：

1、从多个视角看待世界。只用女性的或者自己喜欢的视角看世界，其实非常狭隘。拥有多个看世界的视角，才能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度。甚至只有通过以多个视角看世界的训练，才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知识和认知，然后才可以从中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以及有更大的可能性。

2、有能力获得自我幸福感。人一生中，幸福感对工作、生活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人们在职业上的发展，源于在职业当中有持续的贡献，以及对于贡献本身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也支撑着人不断地成长。女性领导者自身同样要有能力获得自我幸福感，能平衡工作与生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是决定员工幸福度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优秀的女性领导者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值得相互交流。

3、拥有明确的精神追求。管理者尤其是女性管理者精神上的独立是非常关键的部分，也是女性造就自我领导力和构建内在定力的核心来源。认知和精神独立的最大挑战，在于做到不在意外部的评价、有真正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能回归内心的价值判断。

我特别希望大家更像一个植物，而不是像一个动物。就像一棵树，能够从小长大，因为它能够不断地向下扎根，让自己有非常坚定、丰富的根系，从而给自己更强的支撑和定力，在给定的外部环境里寻求到力量的来源，然后长成参天大树。



对于女性管理者来讲，有可能身处不同的环境里，也可能环境本身有非常多的挑战或很多好的机遇，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晰的内心价值判断，不要在意外部评价。

我的偶像是居里夫人，我一直深受她的影响。她有一段话说：“我相信我们应该在一种理想主义之中去找精神上的力量，这种理想主义能够不使我们骄傲，而又能够使我们把希望和梦想放得很高”。这恰恰也表明，居里夫人能够做出伟大

贡献，因为拥有内在精神上的支撑力量。希望我们都具备这种力量。

在这个时代，包括数字化转型，女性管理者最大的挑战可能不在于技能，而在于心性。尽管女性有独特的困难、压力，但是不管怎样面对环境，可能向上迈进一步来，心性开放，就可能有更加明确的发展机会。这种可能性，需要我们协同更多优秀的组织成员，一起来创造，并共同寻求更大的发展可能性。

浮躁时代，我们为何更需要长期主义？²¹

宫玉振²²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引子：两个故事

我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华为关于小灵通与 3G 的战略选择。

上世纪末，中国电信推出了小灵通，当时的 UT 斯达康和中兴通讯依靠这项业务取得了高速发展。UT 斯达康一年的销售收入曾经达到 100 亿，在当时这是足以让所有企业都为之动心的数字。

华为管理层当然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很快就提交了从事小灵通业务的计划。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任正非否决了这个计划。

任正非否决小灵通的理由是，小灵通注定是一个过渡的、短暂的技术，而 3G 才代表未来，华为不能做机会主义者。

在他看来，错过小灵通，华为可能失去的是一大块利润，但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华为错过了 3G，那将严重影响华为成为一个伟大企业的进程，那才是一个根本性的失策，是绝对不可饶恕的。

华为因此把大部分人力和财力投入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商用的 3G 业务，8 年后的 2009 年，华为终于获得了第一块 3G 牌照。

从那以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华为一飞

冲天，把所有竞争者都抛到了身后。正是因为华为当年在 3G 的豪赌和持续投入，才成就了今天的华为。

至于当时风光一时、占据中国小灵通市场半壁江山的 UT 斯达康，主流市场上，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家企业的身影了。

第二个故事是马云与阿里云。

今天的云计算领域中，阿里云排名亚太第一，世界第三。百度按理说在这方面更具优势，可是百度云为什么远远不如阿里云？

当年云计算所需的投入非常大，每年十几亿，连续几年的时间，这给阿里造成了巨大的资金压力，而且还看不到希望。当时在阿里负责云计算的王坚，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一度被认为是个骗子。

那几年阿里每年的战略会都要讨论一个问题：要不要取消这个项目、解散这个团队？云计算团队很长时间都是惶恐不安，不知什么时间会被解散。

在最艰难的时候，马云来到了云计算团队，跟他们讲：云计算我们一定要做，而且我要投 100 亿。整个团队的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大家知道没事儿了。

21. 本文根据宫玉振在 2022 年 2 月 26 日北大国发院 MBA 讲坛第 42 讲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22. 宫玉振：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2年，认为云计算前途无望的百度解散了自己的云计算团队，这个团队后来被阿里完整接收。云计算的最终结局，从那一刻基本就已经确定了。

马云讲过一句话：阿里今天做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了七、八年以后的战略布局。阿里云的最终胜出，靠的就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战略。

三种类型的胜利

我们都想打胜仗，“打胜仗”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但我们究竟应该打什么样的胜仗？我们究竟应该要什么样的胜利？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老师关于“打胜仗”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她说胜利分三种类型：机会主义者只能得到暂时性的胜利，实用主义者会获得阶段性的胜利，长期主义者才能赢得持续性的胜利。

我非常同意陈老师这个观点。我最早是学历史的，我可以从历史上组织兴衰的长远规律来呼应一下陈老师的观点。

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哪一支土匪或军阀的队伍能够真正成事。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最后胜出的一定是有着清晰的长期理念的那支力量。

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道理：坚持长期主义才能赢得长久的胜利。

坚持长期主义为什么非常难？

既然长期主义这么重要、这么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长期主义者少之又少？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要谈长期主义？

很简单：坚持长期主义非常难。

回顾任正非关于小灵通的决策，今天我们会赞叹任正非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做出了正确

的选择。可是有谁知道任正非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任正非放弃了小灵通，但是小灵通在2000年到2003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UT斯达康因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变成了一家明星企业，中兴也在小灵通市场里赚得盆满钵满，而且他们利用小灵通取得的高额利润不断挤压华为的市场。2003年中兴的销售额一度达到了华为的80%。

华为是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老大，但在那段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华为失去了瓜分小灵通市场的时机，更雪上加霜的是，3G牌照迟迟不发放，因此华为在3G领域的巨大投入长期得不到任何回报。

2002年，华为首次尝到了巨额亏损的苦头。那时候很多人对华为失去了信心，认为任正非犯了一个致命且愚蠢的错误，不少人离开华为，选择了在当时看来更好的公司。

任正非后来讲：“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为了一个TD，我痛苦了8到10年。我不让做，会不会使公司就走向错误，崩溃了？做了，是否会损失我争夺战略高地的资源？”

我们今天复盘一下任正非当时的处境：眼前的利益唾手可得，当前的压力实实在在，但是未来的收益却并不确定。如果你是任正非，你会怎么办？

焦虑、抑郁、彷徨，中途反悔甚至放弃。这就是长期主义者常常必须面对的现实。

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斯坦福棉花糖实验”。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选了十几名幼儿园的孩子，让他们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要求坐满15分钟。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孩子们最爱吃的棉花糖。

实验的规则是，如果你马上吃掉糖，就不能获得奖励；如果你能等15分钟以后再吃，就会额外得到一块糖作为奖励；不愿意等的孩子可以按桌子上的铃。

实验开始以后，研究人员发现一部分孩子不假思索立即抓起眼前的糖吃掉了；有些孩子 30 秒以后陆续开始按铃；最后，只有 30% 左右的孩子等到 15 分钟期满才吃糖。

研究人员对参加实验的孩子进行跟踪，发现那些愿意等待的孩子在后来的人生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包括职业的成功；那些不擅长等待的孩子，成年以后体重更容易超标，成就相对较低，而且不少人染上了毒品。

这个实验提出了“延迟满足”的概念。能够做到延迟满足的人总是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最喜欢讲的一个词就是“延迟满足”。张一鸣的成功也告诉我们延迟满足确实很重要。问题是，道理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能够真正做到“长远思考”“延迟满足”的企业和个人少之又少？为什么长期主义特别难？

这是今天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都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理论”。也就是在大而迟（Larger - Later, LL）的收益与小而早（Smaller - Sooner, SS）的收益之间，人们的选择倾向。

所有这方面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相对于未来的收益，人们通常会对当下可以获得的收益赋予更大的权重。直白地说，就是人们更看重眼前马上能够得到的收益。

原因很简单，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虽然发展出了对未来进行计划和规划的能力，但是在跨期选择时，我们同其它动物一样，依然偏好于即刻的奖赏。

一些研究者还探讨了跨期选择的神经机制。2004 年，《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第一次从神经机制上证明人的大脑有 β 、 δ 两种不同的评估机制。

β 机制集中于早期进化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系

统，主要负责加工当前选项，也就是当前马上要做出的决策、当前的诱惑、当前的利益等； δ 系统是相对较晚进化成的额 - 顶系统，主要负责加工延迟选项，也就是延迟满足的决策。

前者是生存的本能，后者是进化的需要。两个系统的相对激活水平，决定了被试者的选择。选择过程中，如果我们的 β 系统被激活，我们就会选择当前的收益；如果 δ 系统被激活，选择的的就是延迟满足。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跨期选择的认知机制理论，即热 / 冷系统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脑认知机制中存在热、冷两个系统。热系统与个体的冲动行为有关，它是情绪驱动的，表现为简单的条件反射，因而反应速度较快，是较早成熟的一套系统；冷系统则与个体的自我控制有关，它是认知驱动的，比较审慎，因此也比较慢，是较晚成熟的一套系统。

热 / 冷系统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个体在延迟满足中的表现。热系统起主导作用时，个体倾向于选择小而早的收益；冷系统起主导作用时，个体倾向于选择大而迟的收益。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提出了人类跨期选择的多重自我理论（Multiple-Selves Theory）：“目光短浅（myopic）的自我”与“目光长远（farsighted）的自我”，“计划者（planner）”和“实施者（doer）”，“老练（sophisticated）的自我”与“幼稚（naïve）的自我”，等等。

理论是枯燥的，我在这里不想过多介绍理论本身。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告诉管理者什么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身上都有短期主义的影子。更看重眼前的收益，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况且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普通人来说，面临的当前压力或眼前诱惑越大，人的短视的一面就相对越容易被激活，人就越容易表现出短期主义的倾向。



即使是长期主义者也会有短期行为的冲动，也会中途动摇，每个人都会有内心深处的天人交战。

这就是为什么任正非在已经选择了3G这条长期主义赛道后，仍然会为了放弃小灵通而感到抑郁和压力。我相信李彦宏也是长期主义者，百度也是有长远追求的企业，但是为什么会中途一度放弃云计算？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就是长期主义很难坚持的基本背景。

短期主义会带来长远的伤害

长期主义很难，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选择长期主义？很简单，因为短期主义会给我们带来长远的伤害。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主要是管理，我们看看短期主义对管理者、对组织至少会造成哪些方面的伤害。

短期主义对于管理的第一个危害在领导力层面。短期主义的领导者个人必然表现出缺乏远见、自私自利的特征。缺乏远见的人注定成不了事，而自私自利的人注定没有人追随。

人都有私心，但是领导者必须让更多的人为己所用，甚至还要用比自己更强的人，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因此，领导者必须走出小我，才能成就大我。自私自利的结果一定是众叛亲离。

短期主义对于管理的第二个危害在决策层面。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用两句话很好地揭示了短期主义的危害——“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决策就像下棋一样，有些人可以看到三步、五步之后，甚至更为长远，有些人走一步看一步，只顾眼前。

棋力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法成为一流的高手？就是因为大局观薄弱，因而特别容易陷入眼前和局部的争夺，却无法掌控整个的棋盘。你可以也会取得局部的胜利，但是

你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胜利。

什么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长远的眼光，人就很容易在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陷入各种纠结之中，陷入各种患得患失之中，企业也是如此，赢了眼前，但输掉了长远，赢了局部，但输掉了全局。

过于看重眼前的业绩，就会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伤害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短期主义对于管理的第三个危害在组织层面。习惯了赚快钱的组织，就再也打不了硬仗。一哄而上，结果一定是一哄而散。

对组织而言最忌讳的就是胜则一日千里，负则一败涂地。历史上这样的组织非常多。黄巢、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军为什么最终成不了事？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攻城拔寨，招兵买马，走州过府，随掠而食，哪里粮多就去哪，吃完了再换个地方。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就是组织能力本身的建设，从来没有稳固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的“流寇主义”。

流寇主义在商业世界的表现就是赚快钱，比如那些买买买，但是没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那些今天这个有机会就做这个，明天那个有机会就做那个，却没有核心优势的企业。

历史上，流寇取得的所有胜利都是无根的胜利，注定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永远是草莽英雄，成不了大事。

就根本而言，短期行为表面看来是理性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其实恰恰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短期行为是以明天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利益。

从进化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短期行为只是基于生存的本能，长期主义才是真正成熟的标志。不管对个人还是对组织都是如此。

我们不能仅仅生活在本能之中不可自拔，要对未来进行思考和规划，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品质。

是否具备这种未来的取向，以及未来取向的高低，其实也是优秀的人和平庸的人、优秀的组织和平庸的组织之间的区别。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和弱点，只有承认局限才能超越局限，只有直面弱点才能跳出短期主义的陷阱。

长期主义的价值

短期与长期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过程。短期行为是将资源投到当前，被动应对环境的变动；而长期主义是将资源投到未来，主动塑造自己的命运。

个人和组织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你的资源分配到什么地方，你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只有长期主义才能让你跳出一时一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能力和优势，才能从更长的维度把握好自己和组织的方向与命运。

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长期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目标感来讲，如果一个人只知投机，那么他即使精于算计、苦心经营，也无法走得长远。投机者的路会越走越窄，处境越来越差。更主要的，是失去了更好的未来的可能。而长期主义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持续的动力。方向感和动力是人生成功和组织成功所需的非常关键的两个条件。

第二，从认知上来讲，短期主义是以浮躁应对浮躁，以短视应对短期；而长期主义赋予我们全新的认知框架，让我们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清哪些是一时的喧嚣、泡沫、杂音，哪些才是真正的大势，从而可以在浮躁多变的时代保持内心的从容、宁静与定力。

《大学》里有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实就是从认知到最终结果的全过程。知道未来方向要什么，才能有定力，心定之后，才会静，心不妄动才能从容安详，才能展开深层的思考，

才会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得到最好的结果。

中国人讲“势利”，“利”和“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有大势才能有大利。所以不要先求利，而要先取势。如果只盯着眼前的小利，那得到的最多也只是小利；只有取得大势，才会获得大利。

《孙子兵法》讲过，真正的高手是“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也就是在借势、造势方面下功夫，而不是苛求自己的团队成员或下属。企业管理也是这样，遇到问题时如果没有长远的思考，不能跳出来看问题，就只会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上去争对错。长期主义者会从“势”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长期主义才会让你做出基于长期的选择，这是认知的价值。

第三，从行动上来讲，长期主义可以赋予我们眼前的行动以深远的意义，让我们的努力有了一致性和连续性。

长期主义并不排斥短期行为，不排斥眼前的选择。前面讲过下棋，棋当然要一步一步地下。但一个棋子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是个废子，只有用清晰的战略将棋子联系起来，每个棋子的战略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体现出来。

对未来进行长远思考和规划，会使我们更多地考虑到当前行为会对未来产生的影响，从而把长期目标渗透到眼前的决策中，用长期主义来过滤我们的短期行为。

这样的好处是让我们懂得每一步在做什么，懂得每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会如何促成总体、长远目标的达成。这样我们在梳理、筛选眼前的行动时，就不会受短期诱惑的影响，不会掉入短期主义的陷阱，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短期行为伤害长远的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战术性的机会发展成为战略性的胜利，把眼前的机会发展成为长远的胜利。

第四，从竞争的角度来讲，长期主义是跳出



内卷式竞争的最好选择。

并不是所有人或组织都会选择长期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胜出的一定是长期主义者。

亚马逊的前 CEO 贝佐斯讲过：做一件事把眼光放到未来三年，和你同台竞技的人就很多，但能放到未来七年，和你同台竞争的人就很少了，因为很少有公司愿意做那么长远的打算。

贝佐斯曾问过巴菲特：你的投资理念非常简单，为什么大家不会复制你的做法呢？巴菲特说，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地变富。

长期主义其实是违背人类基于生存的本能的，长期主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的。但是我们知道，少人走的路才是最好的路。在长期主义的道路上，你不会遇到多少竞争者。所以长期主义才是跳出眼前内卷式竞争的最好选择。

如何成为长期主义者？

首先，长期主义是一种觉醒。

想做到长期主义，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自身或者我们的组织都有两套系统在起作用，我们身上都有短期主义的一面。

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认知和承认的现实。因此我们要随时警惕短期主义的冲动，要有意识地选择并不断强化自己的长期主义特质。

长期主义是需要激活、也是可以激活的；是需要强化、也是可以强化的。长期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可以变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换言之，人和组织都是可塑的，短期主义是像地心引力一样的存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用长期主义来校正我们的行为，保证我们不会偏离长期主义的主线。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自身和组织的两套系统，你就很容易滑向短期主义而不自觉。

其次，长期主义是一种信念。

长期主义是关于未来的选择，而未来是不确定的，还并不是现实。所以，一旦失去对未来的信念，人们就会放弃长期主义，追求短期利益。

我和胡大源教授在国发院有一门课，带着学生去实地体验“四渡赤水”，告诉大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究竟该怎么做决策、带团队。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的一部分，长征很伟大，但是参加长征的每个人都走到了最后吗？不会的。

有人会离队，有人会叛变，有人会投降，甚至有些早期很有名的人消失了。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信念出现了动摇。

悲观主义者更容易选择眼前，乐观主义者更容易相信未来。

人只有对未来有信心，才会放下眼前较小的回报，去追求长远较大的回报。人关于未来的信念越强烈，做选择时我们就会越倾向于长期主义，就越能忍受寂寞和痛苦。有些人甚至把这种坚持视作一个愉悦的过程，当成是一个自我突破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从中获得巨大成就感，因为这样是超出了其他人。

作为长期主义者，你必须相信你的信念，你才能实实在在地看见你的未来，未来才会变成真正的现实。长期主义是个人和组织具有持久和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唯一支撑点。

具体而言，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有以下六点“相信”：

第一，相信长期的力量。要相信你的长期理性。在大和小之间，要选大不选小；在长和短之间，要选长不选短。长期理性可以让你从更大的框架、更高的视角、更长的时限来思考你遇到的问题，这样你就会做出最理性的选择。

不要因为短期的理性反而导致了长期的非理性，要相信你的长期理性一定是对的。克制与耐心是人类理性最高贵的品质。相信长期的力量，

你就可以具备这样的品质。

第二，相信信念的力量。我们前面提到的跨期选择研究发现，积极的希望情绪可以提高个体在跨期选择中的自我控制能力。越积极，越相信，选择过程中的自控性就越强。

所谓信念，就是相信正面的理念一定能够实现。强烈的信念是人和组织最主要的力量来源。无论是战争的历史，还是今天企业的创业，一个弱小的组织最终取得胜利，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信念，并且相信自己的信念。

“相信信念”这个层面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一定要形成团队的氛围，因为组织内部成员的观点和行为可以相互影响，信念可以相互激励。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长期主义的领导会吸引长期主义的追随者，短期主义的领导必然会吸引那些只追求短期利益的下属或者团队成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信念、信任、信心、信仰可以良性地互相促进。

团队内部的相互信任会使得成员都更倾向于相信这个团队的整体信念，一群人在一起相互吸引，相互激发，释放出无穷的潜力，最后把信念变成现实。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曾鸣教授讲过一句话我非常认可：组织的愿景是用来相信的，不是用来挑战的。如果成员怀疑和质疑组织的愿景，事情就根本做不成，必须相信它，它才会变成现实。

第三，相信共生的力量。不管在任何领域里，竞争和敌对意识会影响你的战略和思考。如果你陷入跟对手较劲的死结当中不可自拔，那么即使你赢了，也是残局。

如果从现在看未来，那么你的眼光一定会局限于资源的争夺，你的眼中全是对手；但是如果从未来看现在，从长期主义的角度回头看现在，你关注的就是如何创造出未来的大局，甚至眼前的竞争者都可以被纳入到你共创未来的大局中。

所以，不要只盯着一时的胜负得失，而要着眼于不断演化的大局。相信共生的力量，你才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

第四，相信基本面的力量。基本面就是管理中的基本优势，包括人才、文化、战略、组织、领导力、执行。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商业化的今天，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浮躁的环境中，人和组织很容易在走的过程迷失自己。最终是管理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普通、最质朴的常识性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匹配程度，决定了你和组织到底能走多远。有了扎实的组织才能更好地打仗，才会取得更大的、持续性的胜利。

我们经常会把眼前的短期业绩跟组织的长远投入对立起来，看重眼前的业绩往往就忽略了组织长远的发展。但是，真正的好组织、真正的长期主义，就是通过组织能力的构建、基本面的夯实来给自己创造取得更好更大的业绩的机会。更长远来讲，夯实你和组织的基本面，才能夯实组织的根基，才可以在动荡的环境中经历大风大浪而岿然屹立。

第五，相信专注的力量。我们要在一个清晰的方向持续不断地投入和累积。长期的价值创造一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要你的大方向没有错，只要你愿意在这个大方向上持续不断地投入，最终你大赢的可能性反而比你四处出击要高出很多。

第六，相信向善的力量。今天的行业和市场一直在不断变化，但是我们看到，人类向善利他的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从进化的角度讲，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为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才会得到社会长期的奖励。只有形成合作、利他、向善意识的社会，才能在进化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几乎所有世界性的宗教和世界性的思想体系都是教人向善的。其实企业也是如此，企业的终极意义就是创造社会价值，推动人类进步，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才能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和正向循环。



企业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是缺乏道德感的企业无法走得长远。长期的成功一定是价值观的成功，伟大的企业一定是向善的企业。这是让自己和组织变得强大的一种精神内核，能够历经任何挫折，实现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平庸和卓越的最大区别。

那些为社会创造长远价值的企业，社会最终一定会给它长远的奖励。

最后，长期主义是一场修炼。

认识到长期主义很容易，做到非常难。我们必须认知到这个现实，因为人性是有弱点的，我们永远要面对大脑中两套系统的纠结。

知易行难。在长期与短期之间、在全局与局部之间、在追求使命与追逐眼前利益之间，当这些纠结出现的关键时刻，你究竟如何抉择，最能暴露你深层次的追求究竟是什么，也最能决定你和组织的最终命运。

在坚持长期主义的过程中，你会动摇，会怀疑，也会犹豫，但这反而恰恰是你和你的组织成长、成熟的过程。

结束语

如何成为长期主义者？很简单，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管理就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人生也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回到我们的主题：浮躁的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长期主义？因为这是唯一难而正确的事情。

我非常喜欢下面这段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套用这段话我想说：真正的长期主义者绝不是永没有短期选择的冲动，只是永不被短期的冲动所动摇罢了。

最后我想用一段歌词来结束我的分享：“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该如何存在？”

这是歌手汪峰的追问，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追问。路就在脚下，人是可以选择的，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你就会有怎样的人生。



一、2022年1月，北大国发院党委副书记、经济学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获聘教育部2021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之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管理学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及研究主管谢绚丽获聘教育部2021年度“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022年2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受邀成为国际经济学一流刊物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主编。

二、2022年3月8日，北大国发院携手亚马逊中国在北大承泽园举办女性领导力论坛。围绕“打破偏见释放柔性：数字化时代的女性领导力”主题，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执行总裁 Cindy Tai（戴铮斐），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教授，相继发表主题演讲。圆桌讨论环节，亚马逊中国公关负责人阎妍，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运营及公共事务副总裁、北大国发院 EMBA 校友商容，北大国发院管理学副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谢绚丽，蕾明视康大中华区 CEO、北大国发院 EMBA 校友潘艺琼，北大国发院 MBA 中心兼职业发展部主任于斌共五位嘉宾同台展开深

度对话。论坛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

三、2022年3月10日下午，北大国发院校友会办公室揭幕仪式在承泽园隆重举行。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国发院校友会会长周延，校友会副会长王平，执行副会长田汉、高明旭、余毅，执行副秘书长高瑞、邢哲铭、张燕，办公室设计师韩秋莹，以及校友部老师等共同出席揭幕仪式。活动由校友高瑞主持。

四、2022年3月19日-20日，北大国发院商业领航家项目在承泽园启动并举行首期主题研讨会。启动仪式特邀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会长、中国市长协会顾问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杨捷，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税务报》社原社长蔡宇出席。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副部级）、十一届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吴忠泽，京东集团副总裁、本期商业领航家项目学员代表吕守升，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保群，共同出席并致辞。启动仪式后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习研讨。

版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辑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 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